非一般的外交家（末代港督彭定康回忆录）

第一部分 1.自序

在驻曼谷或者柏林的一些大使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最狂热期待的瞬间是起草其最后的演说。在威尔特郡退休之前，他们可以把处理事务的权力摆在一边，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外交大臣和他们的高级同僚，并告诉他们自己对整体外交事务，特别是与所服务过的国家的关系的真实想法。

这是我自己的告别演说——至少是暂时的告别。这里包含了很多我一直想说的东西。但直到现在我才能这么坦白地陈述出自己对于英国、欧洲、美国和快速变化的世界的看法，包括世界局势的发展过程及我们该怎样应对今后的挑战等。这本书还展现了很多世界重要事件，以及试图去主导世界局势的政治领导人们的奇闻轶事。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谈论或者写作外交政策和世界局势是专家的专利，其实不是。外交跟所有人相关，而且它可以被所有人很好地理解。我们可以把世界变得更好，但我们首先需要很好地了解它。

第一部分 2.我们年已六十（1）

动笔写本书之前的几个月，我刚刚过完 60 岁的生日。除了收到一大堆向我祝寿的贺卡之外，我还通过邮局得知我有资格领取冬季取暖津贴，并且收到了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和火车的申请表。我想，这些都是欧洲著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模式的极好例子。但是由于欧洲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近期在经济复苏方面的努力不够，欧洲福利模式急需进行全面的改革。社会的安定需要经济增长来维持，而经济的增长则需要人来创造。

欧洲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设想有待重新审视。我这一代人从长大成人到年老退休，对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如何变得繁荣和安全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也需要重新进行反思。在国际治理和联盟方面，以前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欧洲一体化和西方共享的价值观转瞬间已经被另一套陈词滥调所取代，包括变化的政治版图、扩张到缓冲区的欧盟以及由共和国变成“帝国”的美国。政治中没有永恒，只是英国看起来一直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求定位：是完全融入欧洲，还是在后帝国时代充当美国的配角，或至少是为美国的所作所为进行诠释和辩护？同时，长期以来历经波折的欧洲宏伟计划，即创建自由贸易的民主国家同盟，始于调节英法之间的矛盾，现在却朝着其缔造者所没有想到的方向迅猛发展。华盛顿的自由世界领导人似乎很热衷于结束这一由他们带头撰写的历史篇章。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历史篇章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并维系着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活。如果西方阵线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或者被重大事件和文化分裂所打破，那么在中国和印度崛起并重塑世界权力政治之前的短暂几年里又将会出现怎样的国际格局？

我的一生都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仰慕者，它故意选择不将君主统治的意识强加在其居

民头上，不得不说这有点政治天才的味道。我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个月出生，这次登陆标志着美国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将军队和血腥第二次带上了欧洲国家的土地。我父亲没有参与登陆，当时他抛下已怀孕的妻子和我的姐姐跟随英国皇家空军在巴勒斯坦服役。我母亲把战时的家安在她父母所在的埃克塞特——一座主教住辖的城市。直到埃克塞特在一次空袭中大部分被夷为平地，她才离开这座城市，北上到了布莱克浦之外的兰开夏海岸，住在我姑父的海边寓所里。姑父是一位成功的蔬菜批发商，那座寓所是他用进口爱尔兰土豆所赚的钱购买的，我就出生在那个还算舒适的家里。在 19 世纪，土豆的极度匮乏迫使我父亲的祖先从爱尔兰迁到了兰开夏。

我岳父不如我父亲那么幸运。作为电影《火的战车》中所记录的年轻人之后一辈剑桥大学运动员，他参加了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上的跨栏比赛，在帝国化学实业公司谋过职，二战爆发后参加了西福斯高地团，从北非打到西西里，再到诺曼底，正好赶上波卡基村高地战役。盟军在法莱斯突围后不久，他就牺牲了，之后不久我妻子出生了。他所在的剑桥大学彭布鲁克学院的阵亡名单中有德国人的名字，也有英国人、英国自治领的人和美国人的名字。牛津和剑桥其他学院的纪念碑也是如此。我们把年轻人聚集在这些享有盛名的学府来学习西方文明，然而他们学成回国后却不得不在战争期间相互残杀。他们从被红衣主教纽曼称为“成荫的小树林”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各学院转到壕沟和坦克中，并被掩埋在欧洲的战争坟墓里，比如西福斯高地团的约翰·桑顿少校，他安息在法国卡昂的附近。

那些来自城市和乡村的美国士兵再次把欧洲从狂热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血腥后果中拯救了出来，他们的领袖相信美国的年轻人不应该第三次跨过大西洋去拯救欧洲这个旧世界。欧洲的墓地已经掩埋了太多年轻的美国英雄们，因此美国领导人、决策者和外交官不遗余力地支持法、德和其他四国通过独特的主权共享来防止欧洲再次陷入内战。这种主权共享最初是通过创建煤钢共同体来实现的，因为煤和钢是支持现代战争冲突的原材料。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成了美国地缘战略的目标，华盛顿希望英国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组成部分。英国想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亲密朋友和受尊敬的伙伴的身份，来心平气和地坐观并支持新欧洲的建设，领导由其全球帝国蜕变而成的英联邦，并理性地祝愿欧洲大陆的邻国在形成联盟的努力中取得进展。然而，我们的美国朋友并不赞同我们这样的想法。无论我们在近代史中如何英勇无畏，也不管丘吉尔的言词有多么庄严，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坐上主桌的邀请，但是英国已不再享有支配地位。

在我长大成人的那些年里，丘吉尔大肆宣扬着英国曾经的辉煌，而在他之后，曾与他并肩作战的陆军中尉艾登和麦克米伦在担任首相期间却以不同的方式面对英国的衰退。从英国皇家空军卸职以后，我父亲前往伦敦。凭着二战前在音乐圈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他成了锡盘巷①的流行音乐出版商。我们住在伦敦西区郊外半独立式的房子里，那里的氛围能瞬间勾起我对儿时的美好回忆。房前花园的气味我立刻就能辨别出来，那是女贞树发出的气味!麦克•弗拉恩在其小说《间谍》的开头也提到过这种气味。在我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女贞篱笆、仿都铎王朝风格的音乐、樱花和擦得锃亮的私家汽车。伦敦市内的主道与地铁线之间弥漫着芳香，从海诺特到西瑞斯利普的中心线路两旁种满鲜花。姐姐和我都在充满慈爱、舒适的家庭氛围里长大，没有遭受半点虐待和艰辛。这种优越的家庭环境足以让今天的音乐创作人起诉我父亲克扣版税。我父母都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事实上，我猜想母亲会觉得过多地参与政治或者宗教讨论是件不太光彩且很不舒服的事，更不用说那种粗暴的政治或宗教争论了。为了能和父亲结婚，母亲转信天主教，但她对宗教信仰的理解程度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们遵照天主教教义按部就班地生活：周日做弥撒，周五吃鱼，姐姐上教会学校，而我则幸运地加入了本笃

会①。我在圣斯蒂芬兄弟会为本地牧师（基本上都是爱尔兰人）做过祭坛侍童，现在我还大体上记得做拉丁弥撒时需要做出的回应。此外，我还隐隐记得牧师呼出的气息让清晨的空气带有圣餐酒的味道，在一次葬礼弥撒中我还闻到过一股更浓的气味。

我回忆起的第一件国际大事便是《每日快报》登载的英国王牌军“格洛斯特营”在朝鲜战争中的事迹,但后果尤为严重的是英国于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的溃败。在此前不久，父亲面带尴尬地把我叫到一旁，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向我解释了我如何能在人类种族延续中发挥作用。他再次表示想和我私底下说几句话，并且要求我不能把他说的话告诉母亲和姐姐，因为那样做只会让她们担心。他告诉我当时中东的局势看起来非常危险，英法对埃及的入侵可能会引发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而此时的武器比他在二战中所见到的任何武器都更具杀伤力。因此，我必须要准备好以超过实际年龄的成熟方式行事，比如承担起照顾我母亲和姐姐的责任。我们心情沉重地悄悄回到母亲和姐姐身边，而她们对父亲的忧虑并未察觉。幸运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悬崖勒马，中断了这场疯狂的中东冒险，其中部分原因是他适当考虑到了此事在阿拉伯世界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在此之后，安东尼·艾登去了加勒比海，随后又住进威尔特郡的一座庄园养老，哈罗德·麦克米伦入主（用哈罗德·威尔逊的话来说是“先进先出”）唐宁街，而我则重新开始打板球，读柯南·道尔写的小说。

第一部分 3.我们年已六十（2）

我家的藏书并不是很多，有内维尔·舒特、哈特利和尼古拉斯·蒙瑟拉特所写的书，以及托尔·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还有一些关于二战英雄事迹的书，包括逃亡、破坏水库、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等。最重要的是，我家还有戴蒙·鲁尼恩和S.J.佩雷尔曼的作品。我认为，这标志着我们平静且自然地接受了美国文化的统治地位，这种态度也许是我父亲的工作造成的。在噪音爵士乐①和默西之声②出现之前，他发行的大部分流行音乐都来自大西洋彼岸，比如由约翰尼·雷、弗朗基·莱恩和盖伊·米切尔演唱的红极一时的歌曲。他首批大获成功的唱片之一就是盖伊·米切尔演唱的“她戴着红羽毛，穿着夏威夷草裙”。当然，我父母的品味要比上述唱片更高雅。我们的爵士乐唱片是由弗兰克·西纳特拉、埃拉·菲茨杰拉德和大乐队爵士乐主唱。我们从骨子里仰慕和尊重美国迷人、大气和令人惊叹的音乐。毋庸置疑，我们是坚定的崇美者，因为所有看似最有见地又最狂野、最诙谐又最明智的东西都来自大西洋彼岸。每周光顾电影院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美国的喜爱。每次去看电影，父亲都会说：“如果我们进不去，不要失望。”我们去遍了周围的郊区电影院，追寻着好莱坞开辟的文化之旅。直到去牛津大学后，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其他的国家也在拍电影。

虽然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们热爱美国和大多数来自美国的东西。尽管每天阅读比弗布鲁克爵士创办的日报，我们对欧洲大陆的邻邦仍有很好的感情。我母亲和我大多数朋友的母亲有所不同，她在烧菜时会使用大蒜，有时去索霍区的意大利熟食店采购，并以此证明不去药店也能买到橄榄油。我们还去拥有地中海异域风情的饭店用餐，那里的灯是用柳条做罩的基安蒂红葡萄酒瓶做的。我们有时会用葡萄酒佐餐。长我5岁的姐姐离开女子修道院学校后去了法国中学，之后又去了斯特拉斯堡，在欧洲理事会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此后，她转到罗马，为联合国工作。有时候我们也去国外度假，我们选择法国西北的布列塔尼而不是英国的德文郡去打沙滩板球，这让当地人很吃惊。第一次去国外度假时，我们开着父亲的兰彻斯特轿车，沿着法国平整的公路到了卢森堡。返程途中我们游览了巴黎，在这次旅行中出现了一次意外——我把自己反锁在了威普勒宾馆的浴室里。这次事件让我整个童年都对宾馆浴室的锁充满了畏惧。

除了这些假期旅行之外，我父亲还偶尔出差去卢森堡广播电台。那是一家非法经营的电台，能把流行音乐和霍勒斯·巴彻勒在凯恩舍姆预测的赌球结果传到英国年轻人的收音机里。通过旅行和出差，我父亲对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战后重建能力产生了强烈的钦佩之情。他觉得法国经济的提升几乎可以用“驾车般的平稳顺畅”来形容，用这个比喻是因为法国本土的基础设施在战后重建中大大改善。他对德国复兴的赞赏是无以复加的。由于生性慷慨善良，他更愿意谈论德国从战时的饥饿和废墟中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而不是他和战友们与德军交战时所蹉跎的岁月。在他眼中，德国经济的成功崛起足以使其加入当时的共同市场。他和哈罗德·麦克米伦有类似的看法，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于1962年去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在那里，我首次听到演讲者以令人叹服的口才阐述了为什么要创立共同市场。我所在的学院是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母校。在我刚上大二的时候，他卸任首相之职，并在随后的一年里以牛津大学校长的身份到我们学院演讲。那是我所听过的最棒的演讲。以后的20年里，我还有幸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好几次演讲。在每次演讲中，他都充分展现了独具舞台艺术的手势和停顿——爱德华式的拖腔、微陷的眼睛、唐纳德·沃尔菲特般的夸张、紧随思想而挥舞的手势、分寸恰当的奚落、丰富的古语和通俗的比喻相结合——所有这些演说技巧都用来支持一个简单的论点，而这一论点我一直都觉得极具说服力，尽管今天我们有了很多新的论据。麦克米伦从1914年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谈起，讲述了当年跟他一起离开牛津的朋友们的故事，他们才华横溢，前往法国皮卡第去拯救欧洲。他以诗人萨松的句子叙述了他们作为“灰色死亡之地的公民”的经历，列数了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追忆了从梅嫩门到蒂耶普瓦尔大拱门的阵亡战士纪念碑，这些纪念碑随着我们卷入另一场可怕的战争而被遗忘。麦克米伦还提到在意大利墨西拿和罗马作出的历史性决定，这些决定是为了防止欧洲大陆第三次惨遭屠戮。他还说，过去得到了我们的大力支持，无论他作为一个老将军现在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们有一天必定也会成为维护欧洲和平的成员。听完麦克米伦的演讲后，自以为无所不知且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强忍泪水，站起来欢呼鼓掌。他们可能意识到，必须首先亲历战争，才能像麦克米伦那样纵论战争。

我在牛津读书的第一年里，肯尼迪总统巧妙地缓解了古巴导弹危机，而我的左翼朋友们则列队前往烈士纪念馆谴责美国人的帝国主义行径。第二年，肯尼迪被枪杀。人的一生中总会经历一些著名的大事，它们让人无法忘怀。我们这些年长的人都记得当时听到肯尼迪遇刺时的感受，就像我们无法忘记2001年9月11日从电视上看到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时我们内心的感受。1963年11月22日的夜晚，我在学院参加一个历史老师组织的晚会，两三个强硬左派的学生突然闯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在达拉斯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肯尼迪的遇刺可以让他们好好庆祝一下，因为接任的总统不可能像广受支持的肯尼迪总统那样用个人魅力去折服世界。在我的大学生涯中，这是我感到最愤怒，也最具政治感的时刻。

此后的几年里，政治并没有成为我生活的主流。我参加过表演，写过滑稽短剧，打过橄榄球和板球，却远远没有充分发挥才智进行有深度的思考。如果说我有什么政治见解的话，那也是毫无立场的想法。我喜欢并倾慕麦克米伦、麦克劳德和巴特勒，认为道格拉斯－霍姆当选保守党领袖是荒谬的。此外，我还被哈罗德·威尔逊现代派的外表所吸引。直到他当选首相并看到他行为消沉后，这种印象才得以改变。我父母是温和内敛的保守党人，他们每次大选都中规中矩地投票，但似乎并不怎么关心政治意见。如果我没有获得首次访问美国的机会，我在政治上很可能不会走得比我父母更远。

我们学院有一位名叫威廉•库利奇的老校友，他家住波士顿，是一名富有的婆罗门教徒。他资助了很多慈善项目，其中一项是在学院设立了一个基金会，目的是为了每年让一批学生在期末考试后跨越大西洋周游美国。我认为他并不只是简单地让我们开阔视野，而是投资培养未来的亲美派。大多数受惠于这个项目的人也确实成了亲美派，包括我在内。那时的奖学金十分丰厚。我们乘坐“法兰西号”豪华客轮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纽约，品尝鸡尾酒，观赏电影，但没能泡上跳起舞来似乎都像女星赛德•查里斯的美国靓妞。然后我们飞往马萨诸塞州，在库利奇先生的寓所住了几天。库利奇先生让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比尔”，他收藏的油画甚至比收藏的美酒更出色。他在哈佛合作社为我们配好了全套服装：轻便西服、宽松裤子、勃艮第便鞋、拌扣领牛津棉质衬衣，还给了我们每人一张赫兹租车信用卡以及一千美元的旅行支票。另外，库利奇先生还为我们每人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所列的都是他的朋友和我们学院的校友，他们分布在美国各地，并且都已表示愿意在我们周游美国时让我们在家中借宿。随后我们两人一组出发，经南线或北线周游美国。

第一部分 4.我们年已六十（3）

我和朋友爱德华·莫蒂默（他后来成了著名的驻外记者、评论家和作家，并在联合国担任通讯和信息主任）一起驾驶着一辆道奇轿车前往俄亥俄州和伊利诺斯州，并一路西行。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了友好而慷慨的接待。这真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正如查尔斯·狄更斯在第二次参观完美国后所说：“我所到之处，无论地方大小，都受到无与伦比的礼貌、亲切、热情以及细致入微的接待。”美国人极善待客之道。从芝加哥到蒙大拿州的比林斯，从盐湖城到旧金山和洛杉矶，我们一路上都享受盛情款待，并且极尽地主之谊的美国人每次都对我们说：“感谢你们的到访。”瓦兹大暴动爆发的时候，我们正在加州南部。在绝大多数暴力行为平息后的一两天，我们开车穿过了令人恐怖的洛杉矶郊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可能是个愚蠢的决定。在我们穿过拉斯维加斯（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裸体广告女郎摆出的法国大革命舞台造型，其历史性让人怀疑）、大峡谷、圣塔菲和新奥尔良返回的时候，我们以一场小冲突的方式邂逅了阿拉巴马州的现代历史。我们当时租用的是一辆挂有宾夕法尼亚州车牌号的车，因而在一个小镇上被误认为是宣传民权的人。在这个小镇上，几个来自北部学校的勇敢年轻人因为宣传黑人的权利于不久前刚被杀害。我们那一段行程的主人是一位谦恭的报社编辑，他帮我们解了围。他向一群农民解释我们是英国人，并说“在那里他们就跟我们一样”。当时我们对这个类比非常感激。

回到纽约后，还有几个星期的奖学金可供我们使用。爱德华选择回牛津参加年度考试，并拿到了牛津大学历史悠久的研究生院万灵学院的奖学金。我应该做什么呢？库利奇先生给我出了个很好的主意。他一个有钱的朋友正在市里为来自曼哈顿富人区的共和党议员约翰•林赛参加市长竞选募集资金。库利奇先生建议我住进他朋友的公寓里（在第5街和第69街上）为竞选帮忙，当时竞选活动的总部设在罗斯福酒店。

我照此建议去为竞选出力，并被指定为一位极其聪明的年轻律师的助手。这位律师名叫舍温·戈德曼，来自得克萨斯州，先后在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求过学。他负责竞选中的研究工作，尤其是研究林赛竞争对手的档案材料。为舍温·戈德曼工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机智幽默、彬彬有礼、慷慨大度并且聪明无比。他手把手地给我上纽约政治和文化的速成课。舍温现在经营纽约市歌剧公司，当时正是因为他，我才得以去大都会歌剧院看了几场巴兰钦主演的芭蕾舞。此外，我还通过观看现场比赛对美式橄榄球有了感性的认识，并在第7大街的卡内基熟食店里第一次吃到了黑麦熏牛肉。

舍温对我从政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从此，政治就成了我血液中的病毒，而我再也无法将之清除出去。我的大脑积极运作起来，专门关注保守派候选人威廉·巴克利以前和现在的意见。这里所说的“保守派”是指比温和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赛更偏右。巴克利属于狂热的保守派，他举止得体、诙谐有趣并且博览群书。他喜欢以出格的方式戏弄人，在他文笔流畅的著作和论文中缺少委婉的表达，毫不顾及某些群体的感受。由于他的所作所为，美国批评家戈尔·维达尔称其为“没有魅力的希特勒”。在他不经意间所发表的言论中寻找无稽之谈和自相矛盾的说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怀疑我收集的大部分材料根本没派上用场。事实上，巴克利根本没把竞选当回事儿。当被问及如果赢得竞选并在令人头疼的纽约担任市长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时，他的回答令人难忘：“我会要求重新计票。”他对我们的主要威胁是可能会拉走一些右翼共和党人的选票，而林赛却需要这些选票来击败身材矮小、毫无魅力的民主党候选人。不过，在竞选活动中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关键的小人物，除了得到很多接触林赛本人的机会之外，也让他们感到新鲜与惊奇：一位年轻英国人的新面孔，举止得体，口音滑稽且用词奇怪。那时我还抽烟，我记得第一次向别人要烟抽的情形，就像贝特曼漫画中的人物那样。

林赛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候选人，就像时代广场上的广告所描述的那样。他高大英俊、时尚优雅、谈吐得体并且非常上镜。他似乎很喜欢政治竞选中的粗俗做法，包括热情打招呼、吃比萨饼、到处与纽约选民拥抱。尽管当时比管理这座庞大、危险却又迷人、腐败的城市更为艰巨的工作并不多，但我私下认为他做市长候选人比当市长更为成功。他最后赢得了这场竞选，将民主党从市政厅扫地出门，而我也随之结束了在纽约令人激动的金秋日子。1965 年 11 月中旬，我登上了陈旧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客轮，花了四天时间在暴风雨中穿越大西洋。

通过这种出乎意料却有些刺激的方式，我开始了政治生涯，加入了保守党研究部年轻男女的行列——他们大部分是出身牛津或剑桥的职业政客。我原以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提供的研究生见习工作之前，我在保守党研究部的工作仅仅是临时的。但让英国广播公司和我所有朋友惊讶的是，我这份临时工作变成了永久的工作。那是我对自身命运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而其余的决定都或多或少与当时的历史事件有关。

在第一次游历美国之后，我不断以不同的身份重返美国，这些身份包括游客、度假者、演讲人、年轻议员、内阁大臣、香港总督、欧洲专员和牛津大学校长。牛津大学的前任校长阿瑟·施莱辛格在称赞罗伊·詹金斯时提到：“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很少有英国政治家对美国感兴趣，或者熟悉美国的历史和制度。”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喷气式飞机使旅行变得方便了，英国才有像詹金斯这样的政治家开始大规模地去美国考察。对于我这一代的政治家来说，不经常访问美国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美国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并且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到美国去做。我仅有两次在美国待的时间较长：一次是在我刚成为议员后，另一次是我担任内阁大臣时。1980 年夏，我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客人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左右，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在那里我结交了很多政治领域的朋友，包括温和的共和党议员吉姆·利奇。如果我需要有人做替身（就像萨达姆·侯赛因那样），他也会乐意去做。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我们之间越来越不分彼此。1989 年，我作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最后一届内阁的新任环境大臣在伯克莱待了一个月，这次行程是由我的好朋友内尔森·波尔斯比教授安排的。波尔斯比教授是北美思维最敏捷、言辞最犀利的教授之一。我们在伯克莱美食区附近一幢装有护墙板的新式房子里度假，这幢房子是我们用威斯敏斯特的公寓和威尔特郡的别墅临时交换来的。在房子的前厅中有一架织布机，书架上摆放着印度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导师写的书，意在

净化读者的心灵并改变其生活。这次假期是按照工作假期来安排的，因此我不得不做几次演讲并组织一些研讨会。这些活动在组织程序上要求不高，却让人兴致勃发。政治家们偶尔需要思想按摩，内尔森和其同事提供的思想按摩对我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就像使用丝瓜络按摩有益于皮肤一样。

第一部分 5.我们年已六十（5）

作为一名英国内阁大臣和公务员，我与美国政坛和决策者的接触主要集中在两个议题上（本书的后面对此有详细记叙）。我从事的第一份部长级工作是在吉姆•普赖尔和道格拉斯•赫德领导下的北爱尔兰事务部担任政务次官。此后，我便时断时续地卷入到北爱尔兰的事务中，并参与了促进英伦三岛政治和谈的多项活动。最近，我担任了"维持北爱尔兰治安独立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 1998 年根据《贝尔法斯特协议》成立的。由于立场温和并且是天主教徒，我经常被派往美国参加有关北爱尔兰政治纷争的会议，并就安全问题进行游说。在这些会议上，我与代表都柏林立场的温和派发言人（如彼得·萨瑟兰和玛丽·罗宾逊）站在一边，并与来自北爱尔兰分别代表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和统一主义的领导人同台发言。北爱尔兰的政客往往告诉听众，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敌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他们每争吵完一次，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之间的文化相似性便增加一分。我过去常想，从波士顿到洛杉矶的听众如果观察到这一点，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彼得、玛丽和我都是来自爱尔兰海峡两岸的温和派，我们偶尔会插几句话。

在那个年代面对美国听众演讲，特别是在国会山游说，到处都可以感受到"美国例外论"。这反映了美国在爱尔兰诸多的历史时刻扮演了积极参与者的中心角色，而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这些参与体现在饥荒、帮助救治瘟疫的船队、芬尼亚勇士团的成立以及为支持解放和反殖民统治而进行的军火走私中。很多美国人的态度是天真而非虚伪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将世界整齐地划分为邪恶的恐怖分子和为自由而战的高尚战士是多么主观的看法。那时在美国用"恐怖主义"这个词来形容北爱尔兰的情况很可能会引起争吵。爱尔兰共和军杀害了我的一些朋友。我无法赞同用暴力来实现政治目的——那样做是可恶的。但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不断向美国人表明，爱尔兰共和军能在美国城市里公然筹款并购买武器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我选用的是语气最温和的词）。对于打击爱尔兰恐怖主义的战士来说，美国在这个意义上制造的麻烦可能比利比亚还多。如果恐怖主义能把"我们"与"他们"截然分开，那么美国的这一做法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

我的论述一直都没收到什么成效。我当然承认爱尔兰在历史上遭遇过许多苦难，我正是因为其中最严重的苦难才成了一名英国公民。我反对统一主义者的不合作态度，他们一次又一次在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制造问题，目的是使我们功亏一篑。统一主义的领导人每次被形势所迫而进行谈判时，我们都要让他们的气焰受到打击。我承认要实现我们的安全目标必须要有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尽管这样做会让那些痛恨邪恶、嗜血的恐怖分子的人感到难以接受。在爱尔兰政治以外的情境下，与我进行对话的美国人会把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称为"奖赏暴力"。但爱尔兰共和军在美国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到处筹募资金、购买武器，四处杀戮的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定期访问白宫。直到麦卡特尼姐妹公开谴责爱尔兰共和军并要求伸张正义之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近年来，对恐怖主义毫不姑息的口诛笔伐已是不绝于耳。

在担任"维持北爱尔兰治安独立委员会"主席期间，我几次率团访问美国。我们从地方警察局长那里得到了很多维持治安的技术帮助，他们中有不少是爱尔兰裔。我们还发现，当

应对公共暴乱时，北爱尔兰警察的交战规则比大多数美国警察要粗暴得多。美国的民权组织和政客从各方面质疑我们过去采取的治安做法以及将要采取的措施，目的是确保北爱尔兰改良和重组后的治安服务能以透明的方式适度地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我认为就这些方面进行质疑是完全合理的。此外，我还把消除美国专家的这些疑虑视为我们报告成功的一个标志。对我来说，这次经历让我对阿布格里卜和关塔那摩湾的虐囚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想法。

在早期的政治生涯中，我很少参与欧洲事务。当然，英国在共同市场或我们所谓的欧洲共同体中的成员地位问题夹杂在国家政策当中，这对于保守党和工党来说都是一剂毒药。只有由20世纪80年代工党内讧（部分是由欧洲挑起的）演变而来的自由民主党始终致力于欧洲一体化项目。有些选民会因为对其他政党不满而把选票投给自由民主党，这并不代表认可自由主义的奇想。

我在保守党中的一些同事长期在亲欧组织中工作，他们认为英国应加入欧洲一体化。在党内辩论中，他们所使用的措辞经常和其对手的措辞一样偏激。但保守党中反对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肯定占少数，他们通常被认为有点古怪并且“不合作”，在保守党的主流圈中造成这种印象确实是糟透了。保守党人通常喜欢拥戴其领袖并热衷于得到领袖的好感。由于领导层是亲欧的，因此要示忠就必须亲欧。另外，聪明的年轻政党成员颇具抱负，这种抱负事实上也推动了英国政治体制和政府的发展。他们自然希望继承前辈的态度和远见。试想，怎样做才能得到更大的机会在最重要的议员选区参选？是宣布英国应加入欧洲一体化“俱乐部”并成为其领袖（同时自然地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还是质疑麦克米伦、道格拉斯－霍姆、希思和其他所有人的地缘战略智慧？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大部分报纸会为亲欧的观点而欢呼鼓掌，而对任何异端说法严加批判。那时候有几家报纸比我更不加批判地持亲欧立场，但在随后几年里，他们完全改变了论调，或许是因为欧洲一体化已变成一项艰巨复杂的计划（正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也或许是因为这些报社有了新的老板和编辑，或者原来的老板和编辑在此问题上改弦易辙了。

在本书后面我会检讨欧洲一体化计划到底改变了多少，并考虑我们是否在此进程中上当受骗。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所签的协约与我们实际得到的完全不同。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我们签约的本意是建立自由贸易区，但现在却陷入了联邦制同盟，并且还在向对成员国有支配作用的政治共同体演变。其实当时我们已经是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入一个只不过是自由贸易区的组织确实很奇怪。很显然，欧洲自由贸易区这一组织没能实现我们的经济或政治目标。除了欧洲大臣官职和议会等个别问题外，我们那时参加的欧洲共同体比今天的欧盟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创建联邦制的抱负。伦敦的报社对此种联邦制模式的效力进行过最夸张的报道。

1975年我任保守党研究部主任之后不久，我们便投入了公民复决活动，其目的是为了确定哈罗德·威尔逊就成员资格条件进行谈判所得到的非实质变化是否足以使我们确认英国在共同体中的地位。与英国在欧洲问题上举行的其他两项公民复决一样，这一次又是政府的软弱所致。因为在欧洲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威尔逊想将他领导的政党团结起来。这次成功的公民复决在短期内达到了这一目的，但仅仅是短期而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年时间里，工党在这一问题上分崩离析，致使其内部一些最有魅力的人物纷纷脱离其阵营，并促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成立。这使工党失去了候选资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尼尔·基诺克和托尼·布莱尔将工党重新团结起来为止。工党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动荡预示了10年后保守党内部

同样的问题。

在这次公民复决活动中，我首次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并肩作战。她在不久前的一次反对原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的农民骚乱中被推选为新任领袖。爱德华·希思本已深居简出以抚平伤痛（此后这一过程持续了好多年），但作为党内深孚众望的欧洲人，他还是被推了出来，并在促进党内亲欧共识的运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撒切尔破例乐于充当他的副手，全力协助希思在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方面努力。她做过几次精彩的亲欧演讲，都是由我帮助起草的。无论是在用词还是手势上，她始终和希思保持一致。

第一部分 6.我们年已六十（6）

我妻子拉文德的叔叔德雷克·沃克－史密斯爵士反对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他后来成为终身贵族，以他所在的赫特福德郡选区布洛克斯伯恩为名。德雷克·沃克－史密斯是一名杰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也是一位成功的大律师。他在战后进入下议院，1922 年任“后座议员委员会”主席，并被哈罗德·麦克米伦任命为卫生大臣。他从不支持英国要求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决定。他的论点具有原则性和针对性，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是英国是否要就其在欧洲的地位进行妥协。对德雷克来说，英国历史上的伟大斗争都是为建立和捍卫议会的自主权而进行的。法律在威斯敏斯特制定，由英国本土的法院和法官解释和实施。签订《罗马条约》等于承认另一个立法机构（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享有最高权力，并且接受欧洲法院和法官在维护英国的法治中应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这与英国的历史传统是格格不入的，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人民选择管理自身事务的方式——他们能像过去那样自由吗？而这一做法难道不是在放弃弥足珍贵的自由吗？

德雷克·沃克－史密斯用一流的法庭辩护律师所使用的技巧推行其观点。他遣词造句十分严谨，叙说华丽又不乏诙谐。有一次我听到他宣称：“当我听到’经济和货币联盟‘这个词时，我能毫无困难地将热情控制在公众礼貌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风格在今天的政客中已然不多见。沃克－史密斯在威斯敏斯特奋力抗争，并把他的观点带到欧洲议会上。后来，他担任了欧洲议会的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他从不放弃推行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很执著。但他没有让这种激情冲淡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包括保守党的政治前景、国家利益、负责的政治家消除无知民粹主义的义务以及在所有事情上避免走极端。他与保守党领袖政见不同，但是他没有任何破坏保守党的想法。在最终的决定做出之后，他认为他应该做的就是尽力使决定带来的结果最好。这就是国家利益！不管在欧洲议会还是在欧洲律师组织，他都捍卫着国家利益。

作为内阁大臣，我在布鲁塞尔的首次任职是担任发展部长理事会成员。由于我升任海外发展管理局长时恰好碰上英国在欧洲共同体担任 6 个月的轮值主席国，我不得不仓促开始主持理事会的工作。我们的主要任务和成果是改革欧洲的食物援助政策，防止向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倾销剩余产品，以避免威胁到那些国家维持本土农业生产的能力。我还陷入了《洛美协定》重新谈判的漫长过程，该协定于 1976 年开始生效，目的是用合同贸易和合作协议的方式把欧洲及其大部分的昔日殖民地联系起来。我与一位精明的塞内加尔财政部长共同主持了一个小组委员会，讨论并确定促成这笔交易所需要的援助额度。我发现自己夹在了政府首脑虚夸的政治辞令和他们的财政部长更为实际的考虑当中。在以后很多年中，这种情况不断出现。

在上述职位工作 3 年后，我于 1989 年调到环境部，这是白厅下属的一个庞大繁杂的机构，

职能涵盖从规划、住房、城市重建、供水私有化到地方政府、地方税、国内和国际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敏感问题。环境问题在政治议程中所占的地位急剧上升，在那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打绿色环保牌的候选人得到了很多支持。当时普遍认为在我的前任尼古拉斯·里德利离职后，环境部急需一张更为友好的面孔。尼古拉斯·里德利有很多优秀品质，但缺少公众亲和力。

里德利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关系密切，虔诚地信仰市场的力量。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他都尖锐地批判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他绝非一个安全的政治家。因此，尽管首相撒切尔愿意不时地用他的偏见来支持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她也意识到有必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在他自我引爆的时候受连累。然而像诺曼·泰比一样，里德利确实有到处狂吠的自由。环境大臣里德利的前任迈克尔·赫塞尔廷在 1981 年的骚乱之后，对利物浦的经济和社会复兴积极努力，费尽心思。该市天主教和英国国教主教辖区的大主教和主教对他都特别感激。但是里德利上任后对利物浦毫不关心。几个月之后，利物浦的宗教领袖在征询他的同意后主动拜访他，但据说当时他们会见的气氛十分冷淡。宗教领袖提到，赫塞尔廷先生把自己看成是对利物浦有特别使命的大臣，里德利先生是否能对利物浦怀有同样的感情？里德利打着官腔回答，他有责任保护黄条蟾蜍，有责任治理污染，也有责任清除污水淤泥，因此他估计会将利物浦列入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双方的心意无法相通。

里德利从环境部卸任后调到了贸易与工业部，他大大增加了环境部在欧洲所面对的困难。那时欧洲委员会在大多数北欧成员国的热情支持下正设法提高环境保护的标准。负责环境的专员卡洛·瑞帕·迪·米安纳是意大利人。由于其妻子对他的床上表现公开爆料，他有些声名狼藉并获得了“乌得勒支高潮”这一绰号。这位专员让英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几乎总是比意大利更乐于实施欧洲委员会所做出的任何决定。使事情更为麻烦的是我们正处于供水业私有化的节骨眼上，这项政策在当时大多数公众看来是对自然环境的侵犯，也可能是对圣灵的亵渎。出售供水公司的一个条件是让未来的股东和投资者明白我们所期望的卫生标准，以及为满足这一标准需要做出的额外投资。我试图在欧洲委员会维持政治上可行的立场，但是这些努力不断被里德利暗中破坏。我们本打算在内阁或内阁委员会就某一立场进行辩论，但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开始之前，里德利突然秘密地出现在唐宁街，说服撒切尔相信我们对令人头痛的欧洲人太过软弱，应该采用更强硬的立场。这样，我就从唐宁街得到新的指令，有时候这些指令前后不一，使我在谈判中的灵活性大打折扣。我清楚地记得在北海倾倒污水沉积物的谈判中被逼入困境，这一问题并不容易解释得通，尤其是面对沿海邻国，甚至是义愤填膺的英国度假者的指责（我记得有这样一种说法：“你再也不能在布莱克浦海滩旁游泳了，你只能装装样子。”）。在里德利的秘密游说下，首相府的最后介入让我无计可施。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我备受煎熬。后来我才设法得到了稍微宽松一点的谈判指示。回头来看，欧洲共同体确实提高了我们的环境标准，尤其是在空气和水的质量方面。

第一部分 7.我们年已六十（7）

在环境问题上，撒切尔并不是一个毫无环保意识的人。她很早就意识到化石燃料带来的废气排放以及被大肆破坏的热带雨林正在改变我们的气候。她比大部分人都更早地了解有关温室效应的辩论，并积极支持我在欧洲以及 1990 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为加强“蒙特利尔协定”限制使用溴化物和氟氯化碳所做的努力。在她任首相期间，若不是由于来自欧盟指令的一些压力，她也许更有可能推进一些新举措的实施。

很多人认为是欧洲问题让玛格丽特·撒切尔下台。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这一看法是对

的，尽管实际情况更加微妙复杂。(作为负责实行人头税的大臣，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人头税使玛格丽特·撒切尔逐步失去了大部分公众的支持。由于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就英镑是否应紧跟德国马克抑或是加入欧洲汇率机制问题在内阁争论不休，撒切尔深陷其中并因此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她最擅长的领域，即弄清任何一项政策对支持保守党的选民(私有房屋主和持有不动产的地方税纳税人)所产生的影响。自从 1974 年中期以来，保守党人一直致力于改革地方税收体制，主要是住宅税。大臣们研究了几乎所有的可选办法，最终这帮聪明绝顶的人却选中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愚蠢方案。出于厚道的考虑，我不能列出人头税倡议者的名单。该项税收简单得让人起疑，每位公民都为地方政府服务成本支付同等的金额。人头税没有体现支付能力（只有极度贫困家庭可以减免)，它让所有人均摊地方政府的开支。尽管劳森和财政部表示强烈反对，人头税（政府发言人委婉地称之为社区费）还是在内阁草草通过。值得赞扬的是，劳森的政治判断完全正确。然而在此之后，劳森竭尽所能致力于人头税的推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让他声誉扫地。1989？？1990 年度地方政府的财务结算大大增加了地方纳税人的负担，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从海外发展管理局（在那里让人高兴的是大部分时间不用管国内政治）调到环境部，正好赶上负责第一年人头税的实施。这相当于英式橄榄球比赛中的危险高空传球。我很快就意识到这项新税制会有多么糟糕。总体来说，改革前的住宅税给一般繁华地区拥有中等价位房产的中等收入家庭带来的压力相对最小。对于保守党不占明显优势的选区来说，这是争取游离选民的一种好方式。而新税制却给这些家庭带来了重创，同时也使全国的直接纳税人数一下子翻倍。用厚石板砌成的阴冷的环境部大楼（现在拆了）位于马山街，我走马上任后不久就委托相关机构在部分选区调查人头税实施的第一年里市民要支付的账单到底有何改变。结果可想而知，人头税像寻热式导弹一样直接指向了那些尚未决定把票投给谁的浮动选民。我拿着调查统计数据和一份新方案去见撒切尔。这份方案要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但仍然是可操作的，其目的是为了把人们从旧税制向新税制过渡中所遭受的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劳森怒不可遏地把我痛斥一顿，并向撒切尔抱怨——这并非没有道理。他认为新税制能将地方政府的预算和税赋紧密联系起来，而我提出的方案会让新税制的好处丧失殆尽。撒切尔没有把精力集中于应对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她心烦意乱，忙于策划如何挫败劳森、豪、科尔、密特朗和安德列奥蒂。我们的补救方案在内阁委员会议中一败涂地。虽然议会里的保守党议员暗中嘀咕这一政策会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是否能改变此政策及其倡议者的看法，但这个比黑死病好不了多少的政策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实施了。

随着劳森和豪相继离开内阁，他们之间的这场宿怨才划上了句号，同时也确保了约翰·梅杰的迅速崛起。但每次大臣辞职都会在议会政党内引起更多的怨恨和动荡。失去这样的资深人士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失控。更为麻烦的是，撒切尔似乎混淆了强有力的欧洲外交政策和强迫性的歇斯底里之间的界限。她的嗓门越来越高，支持率却日益下降。她上演的最后一幕令人伤感和悲叹（其后果我在本书后面要讨论）。在下议院做出极好的谢幕表现后，她带着对批评和反对的蔑视走下了舞台。

在梅杰任首相期间，我作为保守党主席在清除人头税后遗症以及与欧洲伙伴国重建更为正常的关系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我陪同首相一起去波恩，他在康纳德·阿登纳基金会（基民党的智库）所作的演讲中以令人难以忘怀的方式承诺英国会恢复在欧洲的核心地位。自从我在保守党研究部任职以来，我与德国基民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十分推崇他们在德国民主政治重建和国家统一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制定的一套哲学体系将市场经济和社会责任结合了起来)。在接受《今日马克思主义》的记者马丁·雅克的采访中，我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这使得我被《每日电讯报》和其他媒体戏称为“秘密的基民党员”。我并不反对这一称号，尽管我对 18 世纪空洞无物的天主教教义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我与德国前总理科尔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可以称得上是过去 50 年里的政治巨人之一。这种融洽关系有利于确保我们制定的目标源自政治判断力而非哲学信仰。英国保守党人在欧洲议会上自成一派，没有加入由基民党人主导的中间偏右集团。这意味着保守党在议会上没有产生本应有的影响力。各国政党纲领有所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能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在欧洲议会议员、首相、外交大臣和议长的大力支持下，我开始结束英国加入中间偏右集团的谈判，事实上，这一谈判过程在撒切尔任首相时就已经开始了。在此过程中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比如向不知名的基民党人解释保守党早就存在了，或许比他们的政党历史还要长两百年，并且保守党并非民粹主义的余党。我还与几位意大利政治家有几次特别费力的交锋，他们不久以后就被司法机关永久免职。最终我们通过谈判实现了目标，取得了不大不小的胜利，尽管这一结果使今天的保守党部分瘫痪。

第一部分 8.我们年已六十（8）

梅杰于 1991 年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的成果标志着对欧盟政策的重大胜利。这次谈判是政党管理与对欧盟外交结合的典范。梅杰以高超的技巧应对内阁和议会的同僚，他让大臣们了解并参与制定谈判的所有底线。谈判的结果让相关各方皆大欢喜。梅杰载誉归来，处处受到以内政大臣肯尼思·贝克为首的热情赞誉。这次谈判获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在随后进行的整个竞选活动中欧盟很少被提及，即使是那些在下届议会中恶意批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人也没有搬出欧洲问题来制造麻烦。在本次选举中，巴斯的选民没有把我选进议会，这样我不得不从全职参与的主流英国政坛中退出。

在香港的 5 年中，我努力使英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享有尊严并体面地退出。此后我回国担任维持北爱尔兰治安委员会主席，随后于 1999 年作为英国的两位欧洲专员之一去了布鲁塞尔，负责处理外交关系。本书多处记录了我任欧洲专员时的工作经历。在那个岗位上，我满腔热情地努力创造欧洲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打交道。

我希望前面的自传介绍能解释我去布鲁塞尔时所持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这些观点就是我的思想行囊，我于 1999 年在可以俯瞰“50 周年纪念公园”的公寓里打开这一行囊，整理我的思想。我怀着对美国的热爱和仰慕到欧盟委员会任职，并带着相应的浪漫感相信英国加入欧盟是正确的历史决定，但同时也认为英国加入欧盟的政治事业与欧洲本身的胜利混为一谈了，另外不务实的政治辞令也阻碍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我有些赞成用“克娄巴特拉的鼻子”①的观点看待历史。不同的人确实可以给事件的进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因此，欧洲单调乏味的现任领导（这还算客气的评价）对于今天的混乱局面多少要负些责任，尤其是在主权共享的欧盟中起核心作用的法国和德国。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定位问题，我稍后会就此阐述。或许，考虑到英国自己上演的闹剧，我们应该理解德法领导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的困难。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只要法国、德国和英国对于自己在欧洲的角色感到困惑，欧洲就会跟着混乱。

法国历来就存在两种欧洲观。戴高乐将军坚信欧洲是由法国和德国领导下的民族国家组成，而德国需在重大的实质性问题上优先考虑法国的国家利益来为其过去还债。哈罗德·麦克米伦在谈到戴高乐时说：“他谈及的欧洲实指法国。”这种传统仍在继续。另一种欧洲观是

让·莫奈提出的，他主张将民族国家并入一个横跨欧洲大陆或至少是西欧的整体。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不管从思想还是政治角度，在这个问题上脚踩两只船而不引起邦交严重不和是很困难的。法国的政治层之所以能比较从容地长时期保持这两种观点，是因为当时法国拥有控制权，主导着布鲁塞尔的行政系统，守护着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项目，例如共同农业政策（theCAP），并提供决策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化。时代不同，习俗各异。法国并没有对欧盟的转变惴惴不安（至少就条约举行全民公决以前），但我对此总有些惊讶。欧盟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其成员成功扩大到25个国家，另一方面也是其他国家深刻变化的结果，尤以德国最为显著。只要法国不明白它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欧洲，只要它时不时异想天开地要回到法国享有与众不同的极富优越感的黄金时代，只要由希拉克总统领导的政治家们对创造就业和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政策仍然充满无知且有害的敌意，法国能起的作用就将大打折扣，而欧洲也会更加贫穷。

偶尔能看到法国人努力维持已难以坚持的路线，对此我有些同情。其中一件事情与我有直接关系。在2004年关于由谁来接替罗马诺·普罗迪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秘密讨论中，左翼和右翼阵营都认真地考虑了我。最积极支持我的是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他刚刚主持完起草欧盟宪法的会议。在一次欧洲外交部长会议的间隙，皮埃尔·德·布瓦西厄来看我。他是法国驻布鲁塞尔的高级官员，特点是愤世嫉俗、善耍手腕并且聪明伶俐。英国需要这样的法国人，这样我们可以不时回想起我们签订《友好协议》是如何的慷慨大度。德·布瓦西厄对我说："我去过爱丽舍宫了，给你带句话。'他们'觉得你很好，但是'他们'不能接受你做主席。"给出的理由很清楚——英国不在欧元区和申根区①之内（由于移民和避难政策）。他表现得彬彬有礼。法国人惊奇地发现跟我一起工作感觉很舒服，他们认为我能进行独立的思考。"让我们说清楚，"我说，"你们不能接受一个英国人做主席？"我的话换来了一个冷漠的微笑。值得一提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曾两次（1985年和1989年）接受法国候选人雅克·德洛尔为主席。我也怀疑在2004年布尔先生很可能会被说服去支持才华出众的法国社会党人、欧盟贸易专员帕斯卡尔·拉米为主席（现已被明智地选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1992年英国任轮值主席国时，我的朋友特里斯坦·加勒尔－琼斯（当时派往欧洲任职的大臣）与德国的科尔总理在爱丁堡的欧洲理事会上（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峰会）讨论了英国在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一事上犹豫不决的问题。加勒尔－琼斯提到了对失去主权的担忧。科尔回答说，他的政治目标一直都是将德国主权融入到更宽广的欧洲主权中。我理解他的这种感受有多么强烈。他在法德历史边境附近长大，那里战火不断。他亲眼目睹了二战带来的可怕后果。他想在欧洲结束分裂和战火。此外，他还相信如果德国融入欧洲并且国家利益与欧洲利益完全一致，那么邻国就更容易接受经济强大且重新统一的德国。为了强调这一点，德国愿意为欧洲政策支付最大的账单——为整个欧盟的农民和相对贫穷的地区提供补助。德国不得不通过为邻邦支付福利金来证明它已将恶魔扼杀。

德国再也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了。德国现在是一个稳定、成功的民主国家，这已成为过去50年里伟大的政治历程之一。在为国家统一支付巨额费用的同时，德国还继续为欧洲其他国家支付额外费用。科尔所倡导的没有战争且德国力量削弱的欧洲现在仍然是正确的，但这一提法可能不会在当代政治领袖中产生共鸣。那么德国想要一个怎样的欧盟呢？是否希望更多的主权被分享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德国越来越反对布鲁塞尔提出的自由经济政策，害怕这些政策会冲走经济结合主义的最后残余。经济结合主义主张国家和市场利益并重，是战后政治解决方案中最缺乏吸引力的部分。德国还用地方政府的自主特权来抵制外来干涉。布鲁塞尔提倡尽量授权给下级做决定，德国在这方面比别的国家做出了更清楚的诠释。英国

和法国为欧洲应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而争吵时，德国是什么立场呢？它的心向着巴黎，而理智上却通常和伦敦保持一致。

第一部分 9.我们年已六十（9）

在法德的大力倡导下，欧盟表达了想在世界舞台上做出更多政治贡献的抱负，并希望成员国尽量在言行方面保持一致，从而提高整体的协同影响力。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论述，尤其是它对美欧关系的影响。美国曾是我们的救世主，但现在却是让我们越来越困惑的合作伙伴和朋友。

让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有时候好像完全背离了它曾经成功指导我们——这些大西洋彼岸的兄弟国家——所采取的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试图创建一个国际协定、规则和制度的网络来淡化国家主权的传统观点，并减少民族主义所带来的过激暴行。威尔逊设想的世界秩序由于华盛顿政府和欧洲的错误而成为泡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尔逊主义再次大行其道，这次美国使其生效，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罗马条约》纷纷出笼，迫使欧洲民族国家把 19 世纪对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的看法丢在脑后。这是唯一适合我们的方式，不仅使我们与苏联共产主义保持自身所希望的距离，也把我们从自身最糟糕、最特殊且最具破坏力的本能中拯救出来。欧洲一体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为得到美国的保护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美国教会了我们在欧洲大陆及更远的版图上分享主权。我们现在全都是威尔逊主义者。

但美国是这样吗？我们来仔细看看所有关于伊拉克、中东、伊朗、阿富汗、联合国的角色、全球民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环境风险的争论。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不就是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吗？也就是，美国仍然信仰它所创造并鼓励和领导其他人（使我们获得了巨大利益)接受的世界吗？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曾经驾轻就熟地统治了我们的心和命运，部分原因就是它避免了使用帝王特权，难道它今天会为宣称自己的帝王权力而在安全和名望上冒险吗？奥古斯都及其最睿智的继承者们保留了他们的传统，通过克制来守卫罗马帝国的边界；爱德华·吉本的伟大历史著作讲述了后来的帝王们忘记那个传统后发生的事情。因此在美国的监护下，欧洲放弃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好战的民族主义政治，现在以并不完美、有些笨拙甚至大吹大擂的新合作方式来专心应对 21 世纪的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似乎一心想要回到它先前敦促我们所放弃的老路上去，回到荷枪实弹的特迪·罗斯福时代，当然现在多了精确制导导弹助阵。难道我们的未来会是过去的翻版吗？我们欧洲是否能做出更大努力来帮助避免这一发展趋势并将我们伟大的朋友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呢？在已成为历史的冷战年代，我们从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中受益匪浅。我们能否用此例子来让美国相信，欧洲仍然是有分量并值得关注的呢？

有时候历史变化悄然而缓慢，让人浑然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国家或时代。但有些时候，变化如戏剧般突如其来，顷刻间天翻地覆。我的另一位朋友威廉·沃尔德格雷夫曾任外交大臣，1989 年初他去柏林访问。在那个时候，民主德国边境护卫队行为恶劣并且不遵守所有已得到认可的公约。他碰巧看到一个自以为已安全游过边境运河的年轻人，结果这个年轻人一爬上西柏林的河岸就被护卫人员逮捕了。沃尔德格雷夫在公开场合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当地顾问告诉他这样做过分了；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是有的，传统做法是要尊重民主德国的敏感。东柏林及其共产主义权力机构需要更加微妙的处理方式。几个月之后，东柏林权力机

构不复存在，因为分割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柏林墙消失了，没有了东柏林也没有了民主德国。没有顾及到民主德国需要的那些微妙的敏感，所有的一切都被扫到历史庞大的垃圾桶里去了。

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也会这样快速变化吗？在西方阵线还未完全消失并受到印度和中国崛起的挑战之前，我们还有时间使局势朝大西洋两岸都满意的方向发展吗？英国将怎么面对这一切并对此做出贡献？随着世界的发展，我们还会努力弄清自身的角色和未来的方向吗？当别人都在创造未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将沉湎于过去？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不列颠这头年迈的狮子的梦想，看看我们是否——借用爱伦·班尼特的想法——真的能够从逍遥音乐会终场之夜中找到好办法。

第二部分 1.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1）

在布莱尔先生的新闻办公室宣布我成为继尼尔·基诺克之后第二位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任职的英国委员后，《每日电讯报》向我无泪道别的同时，也在社论中评论说我正在“背离英国的生活方式”。文中作者使用了一种奇怪的侮辱，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长期上演的英国与欧洲大陆关系的心理剧。就在欧洲大陆的西北岸对面，我们共有的岛屿依然岿然不动，虽然也曾努力将它推向海中央（至少是感情上）。克里斯托弗·布克是英国最主要也是最执着的恐欧盟者之一。他鼓励我们相信在大多数故事中，虽然形式不同，故事各异，但只是很少的情节以各种各样的假象存在着。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即英国已经致力于这场地缘战略肥皂剧 50 多年了，而它不仅包含着重复出现的相同情节，甚至也有着相同的台词和大部分相同的角色。这个故事中没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东西。

《每日电讯报》的这篇社论提出了一个需要定义的大问题，那就是：英国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共识化为乌有，我们正冒险挑起一场争吵，这场争吵可能会冲破之前德雷克·沃克－史密斯曾滔滔不绝地谈及的公众礼仪的界限。无论我们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该问题本身都击中要害，即如何使英国坦然接受它在欧洲的地位。这触动了英国人恐外症的敏感神经。我们听到夜晚远方传来的空袭警笛的哀号，闻到了一股表里不一、胆小懦弱的大蒜气息。那些我们视为珍宝的东西，那些帮助我们成为英国人的事物——几品脱热乎乎的啤酒、几磅自制的香肠、硬币和纸币上的女王头像以及镌刻在巴利和普金的哥特式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民主，都在遭受不怀好意的外国敌人的袭击。所有这些都在发生，因为虔诚的英国纳税人已经被一个自私自利并始终不能当选的精英人物蒙蔽了双眼。因此，那些高高在上、手握大权的人“背弃”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搭乘欧洲之星到布鲁塞尔，以政治事业的名义用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利来换取一堆欧元，而英国选民对此从未同意过，虽然他们曾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政治历程而被骗签约。

一些自称为欧洲怀疑论者的人会抗议，用这样的字眼来进行关于国家认同和对欧态度的争论，讽刺了对欧盟运行方式和所选方向所作的完全明智又适度的批评。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欧洲怀疑论者”这个词涵盖了各种立场，既包括那些批评欧盟某些方面的政策或管理但或多或少还是热情支持英国加入的人，又包括那些厌恶整个事业并想要置身事外的人。有些欧洲怀疑论者想要欧盟修正方针路线，使其对于其他许多国家来说实用又可接受。例如，他们（理智地）希望看到共同农业政策的彻底改革。其他人赞同欧盟的大部分行为，但不喜欢其中的某项政策而并不愿意参与其中。例如，在我看来，完全有可能会有人热情支持英国在欧盟发挥积极作用，却反对我们成为欧元区成员。或许，从中长期来看，自我排除在欧盟

之外是要在经济和政治上付出代价的，但英国前外交官珀西·克拉多克爵士对此看法却颇不以为然。此外，即使在过去的几年里支持英国加入欧元区的那些人，在看到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所遵循的国内政策后，也难以对欧元区做出正面的评价。

那些支持英国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怀疑论者心存疑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质疑对任何人类组织的盲目热衷，对布鲁塞尔的这一组织也不例外。2005 年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的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相信，他们没有表现出狂热的支持是有道理的。他们认可欧盟的政治和经济成果——从单一市场到扩张再到组建一个区域合作的模式，这为整个世界如何合作起来面对共同的威胁、抓住共同的机遇提供了一个范本。他们也注意到欧盟不是一个形成中的超国家，而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民族国家有时候会相互不安地碰撞，太过频繁地运用几乎只有政治家们使用的语言来确定目标，这些政治家们的希望听起来很有远见，但实际上却总是夸大其词。他们或许还会认为，以希拉克和施罗德为首的即将启程的豪华大轿车上的欧洲政治家们所察觉的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天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选民赐给的——良机，并以此来重新审视以前的假设，重新确定目标，而不用推翻整个事业或者改变它现在作为在国家和国际生活的协定区域内分享主权的一个机制的状况。

还有另外三种欧洲怀疑论者，其观点的怀疑程度依次上升，从空想到健忘症再到临近外国恐惧症的敌意。首先，有些人提倡对欧洲采取这样的方式，即英国挑选它乐于接受的政策，协商退出它不喜欢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可以向其他成员国表明他们真正想要加入的是什么样的欧洲，但愿他们能感激只有“我们”才知道什么才是对他们最好的。这种方式背后的假设是其他欧洲国家对我们的需要远远大于我们对他们的需要，并且只要我们对他们说话足够坚定，他们就会顺从我们。这种立场基本上是保守党在野时所正式拥护的。如果该党已经离开政治舞台，那么它将完全无法传达这样的立场。出于宽厚，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幼稚的而非不诚实。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代表了保守党在欧洲所发出的大部分声音。

全民公决中强烈的反对票给了一些保守党批判者胆量来为他们自己的方式宣称胜利。难道现在还不是很明显吗？英国的欧洲怀疑论正在整个欧洲风行。难道我们没有亲眼目睹欧洲的选民们像《费德里奥》里描述的囚徒合唱队一样，终于明白并意识到——这些蠢人们，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早就知道他们自始至终想要的是什么——欧洲计划已经走得太远了，欧洲应该成为完全不同的样子，虽然到底是什么还没有被说清楚。这些欧洲怀疑论者至少能从一件事情中得到安慰：选票显示民族国家仍在生存并发展壮大。尽管有关于创建一个名叫“欧洲”的国家的可怕故事，这里仍有两个欧洲国家投了相同的票，虽然原因各异。

第二部分 2.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2）

第二种欧洲怀疑论者包括相当少的一部分人，他们过去曾热情支持英国加入欧盟。例如，他们认为欧盟最近的发展涉及使我们本国的议会从属于欧洲的机构，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一旦我们成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欧盟立法“将会在法律上被认可有效，并相应地得到执行和遵循”。很难相信 30 年前，任何一个有些常识的成员资格支持者会不了解这一点。例如，在 1966 年的议会辩论中，当哈罗德·威尔逊宣布了他对成员资格这一事情的看法后，爱德华·希思曾明确地提出这一点：

那些说英国人一定意识到了这里面包含着什么的人是对的，这是一种主权的集中。共同体成员国特意这样做以达到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目标值得他们让出部分主权，他

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这样做的？？让出部分主权时，我们同时得以分享整个共同体的主权以及其他成员国的主权。这不只是有时候人们所认为的将主权让给其他国家，而是执行我们自己的主权的同时也在分享其他国家的主权。

此外，在 1975 年的全民公决活动中，这一问题是反对派宣传的中心。未获通过的《欧盟宪法条约》对我们议会和法院的作用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在我的大半生中这种根本性的改变都没有发生。

最后一种欧洲怀疑论者有时候会冒充成前两种之一。这些人自称为怀疑论者，但实际上对欧洲恐惧不已。他们不是想调整英国与欧洲的关系，而是想彻底改变它，甚至是以现有成员接受的任何形式来破坏联盟。当这些改变的努力失败后，他们便想要完全退出——事实上无论有没有任何关于改变的辩论，他们都是想要退出的。有时候他们会审视挪威或瑞士做出的选择，在下章我会谈到这一点。

正如我前面所说，虽然各种所谓的怀疑论者相互之间存在细微差异，这个笼统的表达方式至少包含了某些用有利于我们民族利益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与欧洲的关系时不能成立的政策和态度。欧洲怀疑主义的批判者有权认为带有欧洲怀疑主义倾向的人是最差的而不是最好的，因为增加的欧洲怀疑论者人数与欧盟反对者的强烈态度成功地将关于整个欧洲的争论归结到国家认同这一问题上来。欧盟诽谤者的语言缺乏老练和韵律，也很少有微妙且不动声色的陈述。他们不能够经常地调动重型炮弹，用最具杀伤力的政治指控来猛烈抨击欧盟立场，然后再抱怨说他们被中伤为极端主义者。

难怪部分公民会感到困惑和混乱。几年前，我从东京飞回布鲁塞尔的途中，曾正面接触过这一持续使英国和我们的欧洲伙伴的关系停滞不前的基本问题。我对日本的访问本身就是很好的例子。就在我动身前不久，国内爆发了一场关于英国不加入欧元区是否会对亚洲人在本国投资的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的媒体大讨论。大部分英国新闻媒体对此观点嗤之以鼻。在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颇具民主风格的简朴办公室里，我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晤。我开始就欧日关系令人满意的现状发表了一大堆总体看法。当我结束评论后，小泉先生（几乎不克制他的不耐烦）直奔主题，他问道："英国什么时候加入欧元区？"这种情况在此后一次次的会面里一直持续着，从日本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到贸易大臣再到日本经团联（日本的商业联盟）。如果说日本投资者并未对我们在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最初几年置身事外的态度感到不安，那么他们的代表们如今却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漫不经心。

在 12 千米高空中的英国航空公司的座椅上，我回想着这件事情。当黎明的曙光打破了飞机飞过的冰冻的俄罗斯苔原时，我的思绪被一位迷人的女乘务员打断。她开始帮我摆早餐桌："彭定康先生，您会不会介意我问您一个问题？"我不安地表示乐于接受她的询问，心里想着她接下来会问什么。"您认为，"她说，"英国究竟会不会真的加入欧盟？"

我们可以忘却几十年来所有或高尚或卑鄙的政治行为，可以将满是灰尘的表格和图纸扔满会议桌，也可以将不切实际的废话塞回词典里，但我们究竟会不会真的加入欧盟？到底谁能给予回答？这个问题提醒了我们，它应该是治疗专家和政治科学家的课题。它使政党分裂，将最有前途的政治事业付之一炬，使政府衰竭甚至毁坏，并使我们的部分媒体庸俗不堪，扭曲了关于英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目的的辩论，侵蚀了我们追求国家利益的能力。它还继续在政治阶层中挑起一场集体大崩溃。似乎每届政府最终都屈服于同样的病毒（只有我们最近一

届政府免遭它最坏的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仿佛一只命运之手早已注定我们与欧洲的关系只能是喜怒无常，令人烦躁，这种关系在不久以后会使在其他场合严肃透顶的政治家们为之上演一场跺脚、摆手和骂人的闹剧。但是我们可以宣布布莱尔先生免受这一批判，他的财政大臣努力坚守伟大的英国传统。欧洲大陆在 20 世纪经历了两场可怕的战争和一段长久的和平。我们英国人在 21 世纪里对于和邻邦的关系与 20 世纪初一样感到困扰、迷惑并且意见不一。

现代历史学家（比如琳达·柯莉和诺曼·戴维斯）也坚持着普遍为人接受的看法：我们去捍卫免遭欧洲大陆吞噬的英国精神和英国生活方式只不过是一个概念。英国人所称的《联合法案》（或者用苏格兰人的话说叫《联合条约》）在 1707 年联合王国文化各异的状态下将大不列颠岛上的各民族凝聚在一起。这样一个联盟需要通过赋予其公民以及他们后来的德国君主一种前所未有的共性来加以巩固。英国精神是围绕着“君临国会”、基督教新教徒继位、初期的偶然事件和后期的不懈努力、尽责和伪善所集结起来的强大的帝国、确保霸权的海军力量以及工业革命中的资本主义来构建的。来自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是工业革命最伟大的卫道士（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经常提到这一点），但十分矛盾的是，苏格兰却是反对工业革命的主要堡垒。时间渐渐侵蚀了构成国家认同感的因素。君主政体以一种相当消极的方式保留了大部分人对它的感情。但是在 1953 年的加冕礼上，它失去了外在的一部分魔力和权威，大卫·卡纳蒂形象地将其描述为“一支无能的队伍”。此后不久，为温斯顿·丘吉尔举行的国葬仪式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历史上令人敬畏的一个篇章即将结束。温斯顿·丘吉尔现在仍被公认为是英国民族意识膨胀的源泉。出于可理解的原因，作为国教的新教也与其他基督教派一样惊慌失措，许多教徒开始转向消费主义和其他一些无聊的信仰。在我们的美国朋友努力加速历史进程的同时，大英帝国的支配力量已经被荡涤殆尽。用英联邦取代大英帝国来支撑民族感情的尝试也终成泡影。其他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的技术变革和经济发展使英国的一些产业倒闭，并严重影响了以这些产业为生的群体。英国的国家认同需要有新的动力来源。

第二部分 3.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3）

我们应怎样看待自己？相互竞争的观念产生的效果或许会相互抵消，从而把空间留给近期最重大的历史经历。在很多国家，人们对民族性有着错误的认识。我所偏爱的关于国家认同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乔治·奥威尔的评论上，即首先我们是有绅士风度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警察不带左轮手枪，公交车售票员彬彬有礼，年老的女仆骑着自行车（梅杰使她们很出名）穿过晨雾去参加圣颂典。但即使是在乔治·奥威尔的描绘中，这也只是图画的一部分。他还说到了我们的龋齿、英国的尘垢、酗酒和粗话。亚丁的最后一任英国总督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在哀悼英帝国结束的同时告诉丹尼斯·希利说，当英国最终被历史浪潮所淹没时，留下来的只有两座纪念碑：一个是英式橄榄球的比赛，另一个是“滚蛋（Fuckoff）”这个词。

对我来说，绅士风度却是死不了的。我还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做英国发展大臣时在非洲的一次访问。我们当时从开罗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由于飞机出了点故障，我们只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临时着陆，在那里拖延了几个小时。我们给英国大使馆打电话，但是大使正在乡间旅行。我们决定趁他不在的时候参观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办公室来打发时间。英国建立这个令人称道的机构旨在在世界各地提高其形象和文化价值。当我们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办公室及其图书馆所在的小街区时，我们很吃惊地看到一列长队，一直排到了街道拐角处。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正顶着烈日耐心地排队借书、还书，或浏览已经翻阅得

破旧不堪的英国报纸和周刊。一个年轻人给我看他刚刚读过的一本关于英国探险家的书，里面谈到大卫·李文斯顿、沙克尔顿和斯科特。他对斯科特印象尤其深刻。这充满了高度爱国主义的浪漫色彩——一个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跟我们英国人一样，被一个典型的英国英雄所感动。

这当然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性。代表我们国民的众多英雄虽然倒下了，却仍然让人赞叹。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最早学过的诗歌里有一首是查尔斯·沃尔夫的史诗，描述的是约翰·摩尔爵士在克隆那的葬礼，他曾在半岛战争中掩护过威灵顿撤退。我还记得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没有击鼓，也没有哀乐，

当我们把他的尸体匆忙运到城堡？？

我忘记了最后几行，直到后来冒着暴风雨，在克隆那参加一个纪念摩尔在抗击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并争取西班牙独立的战争中所做贡献的官方集会上，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朋友提醒了我：

徐徐地哀伤地，让他躺下，

浑身还带着荣誉阵地的血迹；

我们没刻一行字，没立一块碑，

只让他的光荣永远伴着他！

斯科特也同样是以雪为被，只有自己的光荣陪伴着他。他同样是一位英雄，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探险被公正地收录到最近出版的《了不起的英国人》一书中。“伟大的斯科特”被誉为英国神话的一部分，用弗格斯·弗莱明的话说：“它是许多民族传统的缩影，包括不朽的低调语言、与可怕逆境的抗争、对外行做法的过分称赞（无论多么不恰当）以及对失败者的支持。”斯科特去世 32 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6 年后，剑桥举行了一次盛会来庆祝为纪念这位探险家而建立的斯科特极地研究所的成立。在这次盛会上，斯坦利·鲍德温说到，对于那些在弗兰德斯战壕的泥泞和鲜血中失去生命的年轻人，斯科特的生命历程和日记曾给他们一种巨大的安慰。鲍德温说，只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只有成功也不够，重在过程。赢并不是一切。忠实于最好的自己和自己的理想，走自己的路，拥有自己的灵魂。这一切是否听起来有点奇怪，有点小学校长在不起眼的小学颁奖日上演讲的味道？这种绅士的、有原则的英雄主义在今天关于认同的辩论中是否能引起共鸣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所有人依然在被历史塑造着，或者如有些人所说被囚禁着，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历史知之甚少。那是关于上次战争中我们“最好的时光”的一段狭窄而有限的历史记忆：那是伟大而富有戏剧性的一刻，我们一直保持的勇气顿时大增（尽管这种勇气在一些方面很可怕），我们的士气高涨，当我们失去生命时，我们是为了“国王和国家”而死。

关于再早一点的历史传奇故事大多数被遗忘了。当我还是议会成员时，我很喜欢于 20

世纪 20 年代布置在圣斯蒂芬教堂大厅里面的油画。它们讲述了辉格党关于英国自由的故事。这个故事从阿尔弗雷德大帝展开，一直讲到《联盟法案》，附带着令人愉快的皇室主线：亨利七世授予约翰·卡伯特寻找新大陆的特许状；伊丽莎白女王许可沃尔特·罗利爵士游历美洲。在威斯敏斯特宫里，建立在最古老的议会民主基础上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所取得的每次进步都得到庆祝。在每块镶板、版画或彩色玻璃窗上的故事都可能会让聚集在议会厅里的公众们想起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知识。不管他们是否真记得卡伯特，也不管他们能否将都铎王朝的君主按正确的顺序排列，英国人都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我们最自由、最勇敢，历史最悠久，也最好。这一点在我们都记得的一件事情上得到印证，那就是我们赢得了战争。

德国文化部部长迈克尔·瑙曼在 1999 年曾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他评价道："英国沉迷于这场战争。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决定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其民族本性、理解和骄傲的精神核心的国家。"尽管这可能有些夸张——当然这种态度不像右翼新闻界希望的那样流行，但这样说的确有几分道理。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独自坚持着，这其中有很多让我们感到骄傲。然而在近些年里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可以感到自豪，人们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用堪称楷模的技巧和比预期更多的荣誉结束了自己的帝国，我们建立了一套顺利运行几十年的福利民主体制，我们基本上以克制的态度进行政治辩论，我们创建了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广播服务；我们和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做斗争，但并没有过分践踏公民自由；我们没有完全忘记被迈克尔·奥克肖特所称赞的社会公德——教养、勇气和善于交际。或许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伟大成就没有得到关注，那就是，我们在帝国衰落过程中避免了暴力或太多的自艾自怜。从战争结束时的"三巨头"之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个半巨头"之一，我们滑落到了什么位置？一个第一流的第二集团国家？我认为是，至少在好的时候是这样，虽然早在 1963 年就欧洲问题辩论的环境下，《泰晤士报》就指出，并没有任何神圣权利可以让我们保持第二集团的领先地位。

第二部分 4.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4）

其他欧洲国家会觉得忘掉过去或者至少是重新创造过去会稍微容易些、方便些，偶尔还会觉得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就像让·莫内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一样："英国没有被征服过？？它觉得不需要忘掉过去。"我们曾经不仅仅是不可战胜，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还独自挺立着，对抗着欧洲大陆的其他大部分国家。有些人从中得到安慰。至少我们知道自己选择的立场。国王乔治六世告诉他的母亲他比以前高兴得多，"因为我们没有要殷勤相待并纵容的同盟"。这有点像经过墓地时吹口哨壮胆的味道。1940 年和 1941 年是一段艰难而又令人忧虑的日子。约翰·科尔维尔爵士（丘吉尔主要的私人秘书）在 1940 年 9 月的日记里写道："对不久就会被入侵的可能性，首相似乎比我意识到的还要担心，他不停地给海军部打电话，询问海峡的天气状况。"国民自卫志愿军已经在白色崖顶整装待发，一缕缕炮烟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上空飘荡，苏联也在东面跃跃欲试——我们九死一生，侥幸存活。

故事的核心是真实的。我们的确孤军奋战，所凭借的只有勇气，依靠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的战斗机飞行员的勇敢和英吉利海峡来保护我们。但是，这样的粗线条描述给传奇故事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当德国军队在英国本土海岸登陆的时候，我们是否都会在海滩上奋战，然后为从北岬到邓杰内斯的每一寸土地而抗争呢？1940 年 5 月，英国战时内阁争论了以谈判方式结束与德敌对局面的可能性。这提醒我们，即使在硝烟正浓的战争氛围下，还是有人支持向罪恶妥协。丘吉尔不仅创造了我们的历史，也书写了我们的历史，英国人性格的另一面丝毫没有在这一辉煌的画面上留下任何阴影。更重要的是，左翼改写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

史和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对于迈克尔·富特和其他人来说，战争及其早期所带来的灾难是我们统治阶级背叛的结果，这些在国家受到威胁时却拒绝武装起来的绥靖者是通敌叛国的有钱人，他们举止像沃德霍斯那样绅士，却支持纳粹。北爱尔兰旧郡伦敦德里很可怕，那里有很多人是反犹太主义的。他们担心自己的贵族利益受到民主和低下阶层的威胁，并认为可以从有些严肃的军国主义纪律中得到最好的保护。但是，左翼的历史观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绥靖政策在 20 世纪 30 年代风靡的一个原因是民众的支持，绥靖政策实际上是人民自己确定的政策；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慕尼黑事件发生之前一直得到约 70%的公众支持，并在事件发生后的民意测验中仍能博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即使在 1935 年克莱门特·艾德礼当选为领袖后放弃了不抵抗主义，富特的工党在战争爆发前的那段时间里仍然在 10 个不同的场合投票反对重整军备。工人阶级的领袖们应该像在克莱夫登的豪宅里醉生梦死的人一样为英国的准备不足和可耻地鼓励德国入侵而受到指责。

其他国家或出于无知，或为了政治便利，或出于必要的图谋保留着各自的民族神话。我无数次听到美国总统们将二战开始的日期定为珍珠港被袭的那一刻。他们忘记了在战争中死去的数以万计波兰人。但是比之法国通过改写历史来满足创造“法国的某种形象”（戴高乐将军措辞的变体）的需要，美国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观还算情有可原。但这种全国团结一致英勇地开展地下斗争抗击德国入侵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概念实在是夸大得太离谱了（即使是将亲法主义扩展到极限也不能接受)。在盟国诺曼底登陆 50 周年纪念日上,《费加罗日报》登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0%的法国人认为自由法国军在 1944？？1945 年的解放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世界报》刊登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全法有一半人认为，法国抵抗运动和盟国在赢得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一样多。相当多的一批战后法国政治家们迅速掌握了辉煌的战争记录，或者去掉了所有更让人怀疑的记录。国家历史便如此被随意篡改。而真正的历史则偶然通过编造的浓雾若隐若现，让人们耿耿于怀，刺痛不已。“或许我有些愤世嫉俗，”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但恐怕这是真的——如果希特勒曾经在伦敦跳过舞，我们就不会和戴高乐有麻烦了。”

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德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被夷为平地。英国出版商维克多·戈伦茨在他的《最黑暗的德国》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在饥饿的边缘挣扎着的国家，欧洲大陆中心到处都是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人群。英国尽管被战争搞得筋疲力尽，但与它战败或解放了的邻国相比，仍是以无与伦比的良好状态进入了和平之年。1947 年，英国的出口量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比荷卢三国经济联盟、挪威以及丹麦出口量的总和。在 20 世纪 40 年代，法郎是很不值钱的货币，结束对抗之后的那年，法国的国民收入仅相当于它 1938 年的水平。德国和意大利情况更糟。即便不是“战利品都属于胜利者”，至少在英国的邻邦们都安定下来开始战后重建时，凯旋的英国已经领先了它们一大步。这个世界要成为什么样子？同盟国和合作伙伴又会形成怎样的结构？

温斯顿·丘吉尔为我们所回忆的历史的最辉煌时刻以及民族认同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的语言比行动更多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棱镜，我们曾试图透过这个多棱镜来辩论和定义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当然，通过分析一个生于 1874 年的政治家的文章和语言来辩论我们在 21 世纪之初处于什么位置、应该走向何方，应该说是很荒唐可笑的。亲欧派、反欧派都在为丘吉尔而争吵，从他身上寻找着控诉历史所需的证词。说实话，作为一个证人，他并不真的适合任何人的论点，但是将他硬扯进今天的政治辩论中这个事实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为什么这场争论是如此的贫乏无力。

第二部分 5.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5）

“亲爱的温斯顿”，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过去常常带着个人对他独有的热爱这样称呼他一样，一定在为数不多的真正的英国民族英雄中名列前茅。作为一位不可超越的战时领袖，他在很多方面被放大了。关于他还有这样一则故事，他重新描画了鲁宾斯一部作品上的老鼠（这幅作品悬挂在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契克斯的楼梯顶部），因为他觉得对于整个作品结构来说它显得太小了。这个故事是经典地体现丘吉尔狂放的例子：大胆革新，自我炫耀，对自我判断和能力极度自信，极其不通情理。他不仅是政治家、领袖人物和历史学家，同时在政治上极有远见。他并不总是正确的。他严重误解了印度，并在看到变化不可避免（尽管他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反对妇女投票。尽管如此，他对将来还是有种独特的直觉，而这种直觉通常都是正确的。他从重大事件中看到的往往比别人更多。他从不害怕有更大的抱负：放开眼界看看将来可能会怎样，然后从思想和政治上发起动员获得支持来迎接这一挑战。他孤独地预言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未来，预见将来与希特勒的战争。相反，在 1946 年密苏里州的富尔顿，他的话引起了关注。他描述一幅铁幕如何降临到欧洲大陆，这个词定义了一个时代。那次演讲的题目不是《铁幕》而是《和平的力量之源》。丘吉尔不是预测凶兆的预言家卡珊德拉，而是一个力求完美的政治家。他相信如果自由世界团结起来，我们就能防止新的战争爆发。

作为亲美的国际主义者，丘吉尔能意识到与大西洋彼岸联盟的重要性并不奇怪。他不知疲倦地努力想把美国拉入战争，直到后来日本代替他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是他总是目光敏锐，他知道美国的目标并不总是与英国的目标一致。这一点在战后伴随着美国加快结束英帝国的决心、苏伊士事件以及英国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人们可能会预料到丘吉尔对美国的好感。但让人惊奇的是他对欧洲有这样一个长远的看法。早在 1930 年，他就写了一篇关于“欧洲合众国”的文章。1946 年在苏黎世的著名演讲中，他呼吁在法德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提议非常引人注目。但他对于英国在这一合众国中起什么作用却总是含糊其词。我们“和欧洲在一起，但不属于它？？同它联系在一起，但并不被包含在内？？与之利益相通且相互关联，但不是被吞并”。他拥护联邦制，但在他眼中，这不过是在英国善意支持下的大陆联邦制。英国则在一个更大的联盟中发挥作用。丘吉尔想象了“三环外交”，包括英帝国（英联邦）、欧洲还有英联邦大西洋彼岸的姻亲。他处在这三环的连接点上——“指环王”。丘吉尔没能预见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力量是如何快速地被削弱，他的帝国是如何快速地蜕变成一个回忆；他也没有看到英联邦随后将担当怎样的一个政治小角色，这并不让人吃惊。令人感到不同凡响的是，尽管他以爱国者著称——的确，他辉煌的生命历程和性格几乎就是爱国主义的定义——他却能够在主权分享这一观念进入政治主流之前的很多年就看到了这一点（对此，我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详细叙述）。

对于在欧洲创建一个新的政治结构，丘吉尔的热情远远高于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英国人。而且对于在 1952 年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他也无疑更为积极。白厅各机构对此深感惊骇，政府公务员和政治家们一方面感到愤怒（因为对于这件事的策划英国被全然蒙在鼓里），另一方面认为这种做法不具备可行性，同时对不得不说服公众接受这类东西感到害怕。赫伯特·莫里森曾令人难忘地宣布：“我们不能这样做。达勒姆的矿工们永远都不会同意的。”1951 年的大选中几乎没有体现对欧洲问题的担忧，大选之后丘吉尔再次执政，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实施他在战后几年里所提出的宏伟远景。他集中精力于冷战峰会以及证明他的体力依然能够胜任在位期间的艰苦工作。在丘吉尔政府任职的艾登和巴特勒则充分体现了当时盛行的对欧洲

一体化主张的排斥；他们的态度使“dehautenbas”（自上而下）这个词在英语中看起来像杜撰出来的通俗用语。这一态度随着 6 个欧盟发起国为达成《罗马条约》而进行的谈判变得更加明朗。艾登政府和麦克米伦政府对这一注定失败的事业先后表示蔑视，或有些自相矛盾地图谋破坏其进程。

英国所宣称的明智公正的公务员传统的信徒们从当时的政府文件中找不到很多的支持证据。但有些人的确清晰地预见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并对此发表言论，只不过他们的言论在英国通常被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早在 1949 年，国防部首席科学顾问亨利・蒂泽德爵士曾准确揭示了英国立场的真正本质：“我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强权，只是暂时受阻于经济困难。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强权，以后也永远不会是。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如果我们继续像强权一样行事，很快我们将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的观点当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皇帝总是最后一个才发现自己并未穿着新装而是赤身裸体，这在政治中早已司空见惯。

战后管制的取消带来了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经济的相对成功，但即使这样也没让人感觉到英国正在积极适应现代世界。在约翰・奥斯本 1957 年的戏剧《艺人》中，喜剧演员阿尔奇・赖斯曾告诫观众：“鼓掌不要太用力？？这座大厦已经很旧了。”当那个 10 年匆匆而过，下一个 10 年接踵而来时，不仅这座大厦显得尤其破旧——其管理者成为那个年代讽刺作家们的笑柄——而且经济发展缓慢，我们突然意识到曾经不屑一顾的共同市场正迎头赶上，甚至有可能把我们抛在其后。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宽松的自由贸易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包括英国和 6 个与我们贸易交往最为频繁的周边国家（我们大部分食物是由这些国家提供的）。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根本无法和共同市场的 6 个国家充满活力的经济相媲美。在我们申请加入共同市场之前的 10 年里，共同市场作为进口来源和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已实质性地超过了我们的自治领伙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欧洲政策上英国真是名副其实的“六神无主”。在美国的鼓励下，麦克米伦政府清醒地意识到，正如罗伯特・皮尔 19 世纪的自由贸易问题曾使保守党分裂一样，他的所作所为也必定会使保守党四分五裂。最后，麦克米伦采取了断然行动。

第二部分 6.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6）

于是，我们便开始了“求婚”、“拒婚”、“定婚”等一系列过程，并进入了这样一个让四邻不安并给社会工作者、“婚姻顾问”和“家庭调解员”带来诸多就业机会的“婚姻”。我们赢得了战争但却输掉了和平，公众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在此情况下英国极不情愿地提出了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但这一申请却在 1963 年被戴高乐总统断然否绝。我们要求按照自己的时间和条件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却对此妄加评断，他们以为自己是谁？他们是我们从前曾征服和拯救过的国家，但现在我们却不得不对他们必恭必敬。既然我们过去明显比他们强，这种奇怪的角色转换又从何而来？在过去 40 年里，这种完全相同的态度和偏见一直很突出，在英国政府每一次谈判和每一次提出欧洲发展方案的方式上亦是如此。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欧洲所作的任何实质性的主动提议都是不可行的。哪怕像约翰・梅杰这样较为温和的政治领袖也会陷入这种病症而不能自拔，他也对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过有声有色的谴责。我们的政治家们宣称，若欧洲的主动提议有任何结果的话，那么结果会如我们所知，这一“权杖之岛”上的民主生活会结束，自由会丧失，经济发展也会被桎梏。当双方商定妥协方案时，我们宣称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胜利，那些被通过的修正和改变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在最近关于《欧盟宪法条约》的谈判中，从宣布红线（我们声称会像在一战战壕中一样誓死守卫）到明言这整件事情就和讨论伦敦电话号码簿的重要性一样，英国的大臣们就在猛烈的媒体轰炸下东躲西藏。在进攻中，我们是外交雄狮；在偶尔必要的撤退中，我们则成了注册会计师，

宣称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没有让步，只是在底线上做了轻微的调整。难怪英国公众会困惑不解。

许多英国人仍怀疑地视同样困惑的欧洲大陆为极其危险的地方。战争年代里，上帝之手曾帮助击退了纳粹部落，这明显是对我们孤军奋战守卫基督文明的认同。长久以来我们都感觉，即使上帝实际上不仅仅属于英国，他仍与该国人民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我们似乎从未留意德国人已经认领了上帝，甚至在士兵的带扣上刻上了“GOTTMITUNS”（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字样。这种向上帝争宠的做法激发了斯夸尔的灵感，他于 1915 年写下这首诗：

上帝听到交战的国家在高歌呐喊：

“上帝惩罚英国!”

“上帝拯救国王!”

求上帝干这干那。

“天啊，”上帝说，“我已经无能为力!”

但是，英国人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直到最近几年，神圣的英国爱国者才明确表明是新教徒。作为信奉天主教的政治家，我可以很坦白地说从未意识到歧视的存在。虽然回溯到 50 年代，天主教徒曾一度被视为异教，例如焚香的共济会成员及我们已废弃了的晦涩难懂的语言。但欧盟对于天主教堂、天主教政治以及社会教义的认同使它较难在英国被接受。毕竟，阿尔夫·加尼特的历史观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观点。“上帝告诉亨利不要理会罗马教皇，在英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他的王国。”就是从那时起，英国开始“战胜世界并按自己的利益统治这个世界”。教皇庇护十二世战时对纳粹暴行保持缄默使欧洲天主教未能赢得英国人的欢心，且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在支持民主的问题上，天主教国家总有点不可靠。1943 年的一封信道出了威廉大主教的忧虑，即奉行独裁主义的宗教组织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身陷独裁主义政治不能自拔，这一忧虑刻画出了当时的氛围。天主教的社会政策也同样引起了不安，它将善意而自相矛盾的目标与日益不合时宜的统治者本能模棱两可地融合在一起。田里的百合花“不劳作，也不纺线”，因此不应过于轻视将《新约》里的寓言和布道转化成政治游戏的做法。但毫无疑问，这种基督民主在英国是吃不开的。

德国和法国甚至更难推销。“我努力尝试，”欧内斯特·贝文对战后英国驻德国军队总司令说，“但是我讨厌德国人。”这种对德国的厌恶感何时才能消除殆尽？“法国投降了，我们已经进入决战。”战时报刊上这样写着。这个笑话一直流传到今天。当然如果你不是德国人，这个笑话要更可笑得多。在 1966 年世界杯总决赛的那个上午，约翰·克里斯在《每日邮报》上一本正经地写道：“如果今天下午在温布利，德国打败了我们的国家体育项目，我们随时可以提醒他们，我们最近也曾在他们的国家项目上打败过他们。”《太阳报》成功阻止了德国士兵参加在伦敦举行的欧洲胜利日周年纪念庆典的活动，它这样写道：“《太阳报》不许德国佬参加。”60 年以后，这些战争的回音似乎不再是民族自尊的反映，而是不健康的成见。说它不健康是因为我们要创造新的历史，而不是活在记忆和战利品中。坦率地说，若法国在遭受德国所有侮辱后仍能坚持向前迈进——至少带着对其莱茵河对岸邻国的尊敬——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问题还有更严重的一面。1945 年泰勒出版了《德国历史进程》，他是在战争年代里受托写这本书向英国读者解释“德国问题”。问题究竟是什么？泰勒在书中第一段清楚地进行了阐述：

德国人的历史是极端的历史，它无所不有，唯独缺少了节制。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德国人除了正常状态之外经历了所有情况。他们曾凌驾于欧洲之上，也曾无助地受别国统治？？只有正常的人——健全、理智而又有分寸——从未在德国历史上留下足迹？？除了剧烈的摇摆，德国历史的一切都不正常。

无论其历史判断如何准确，泰勒的预测能力却被证明是错误的。历史不会重演，但英国政策有时却被截然相反的观点所支配。战后德国由一系列非常“正常的”人——“健全、理智而又有分寸”——所统治。他们的国家取得了恢复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成功。他们用勇敢的诚实和适度的健忘对待历史。科尔总理及其同僚巧妙地促成了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德国的统一，而柏林墙的倒塌成了战后的标志性时刻。那些对联邦德国为欢迎民主德国并成立统一国家所提供的慷慨条件进行的批判，我感觉很荒谬。你不能把一个家庭建立在两套不同的法律、福利和商业基础之上。英国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帮助德国踏上成功之路，那些本应被英国政治家们视为值得庆祝的时刻，却被有些人认为是不祥之兆。我们能阻止统一吗？我们应怎样对待那令人担忧的后果？

第二部分 7.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7）

虽然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公众好像是令人满意地支持德国选择自己的未来，但撒切尔首相却在密特朗总统的主动支持下努力阻止这一历史性事业。其行为在外交上是愚昧的，道义上是错误的。她甚至歪曲事实以证明她在《太阳报》头条上对德国的本能判断是正确的。她和一小组历史学家在首相的乡间别墅契克斯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意在让她更多地了解德国相关问题，但她对这些问题已持有不可动摇的偏见。该研讨会泄露的记录只是反映了她自己的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观点。尼古拉斯·里德利和埃诺奇·鲍威尔一样在其政治生涯之初支持建立欧洲联邦。他的语言可能很接近地反映了撒切尔的个人观点。他允许自己所作的以下评论被引用：欧盟只不过是“德国企图以此接管整个欧洲的一只球拍？？原则上我并不反对让渡主权，但不是给这些人。坦白地说，我们还不如把它交给阿道夫·希特勒？？我不知道我更愿意选择防空洞和反击的机会，还是直接从经济上被接管”。这已经超越了外交上可接受的范围。战争结束达 50 年了，我们又开始在沙滩、登陆处、街道及山头和他们进行对抗。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谈论的是最重要的朋友和同盟之一；值得赞扬的是，它根本不予回击——也许它感受到的只是短暂的痛苦，更多的是日益加剧的轻蔑和怜悯，这比回击还要更糟糕。

恐法症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了——战争、嫉妒、侮慢还有商业竞争。这种恐法症始终与暗地里对法国的羡慕并存——羡慕法国的生活质量、学术成就，甚至有些人还羡慕法国对于美国及其机构所表现出的尊严。也有一些非公开的英国波拿巴主义者，羡慕法国中央集权制的长盛不衰，如它的教育体系（我必须指出这不是我所欣赏的，它与我的自由主义倾向格格不入）。两个固执己见的邻国之间磕磕碰碰自然难免，但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去加以克服。在苏丹发生的法绍达事件差点挑起了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但仅 6 年后我们便签订了《友好协议》，并一直遵守着此协议。在英国举行的该条约签订百年庆祝期间，我分别与希拉克总统及其前任之一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会谈。吉斯卡尔谈到用蝇钓鱼和 P.G.沃德豪斯，以及法国

的上流社会对英国裁剪精良的斜纹软呢服和老于世故的低调的爱慕。希拉克总统则有所不同。坐在牛津大学罗德学院的大厅里，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照在赫伯特·贝克爵士费尽心思设计的仿科茨沃尔德殖民风格的帝国标志上，希拉克总统用抑扬顿挫的法语历数了英法两国之间的所有现代联系——在英国工作的法国人、在法国的英国人、进出口业、投资以及体育上的交流。我们谈到阿尔塞纳·温格在英国的真实世界，也谈到英国人在加斯科涅和多尔多涅省的第二家乡。总统说到在科雷兹山区他自己的家附近，英国居民挽救了许多村庄，他们购买并重建旧房子，使这些村庄重现生命力。我仍能回忆起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英国“鹞”式战斗机飞行员的场景，他读着彼得·梅尔写的一本关于普罗旺斯生活的书，等候着飞机起飞。这是英国人的梦想——在法国乡间的一小片乐土，虽然法国人并不都像梅尔先生书中的角色那样总是将“this”、“that”分别说成“zis”和“zat”。

我们在洛特河边的食品店里买维多麦和酵母酱，将当地的干酪往家里带，干酪溢得满车都是，但一有机会我们还是贬损法国邻居。在上次战争最黑暗的失败时期，我们曾按照丘吉尔的建议大度地接近法国并与之命运相连，但现在我们为什么仍然不信任法国人？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烦人的例外论否定了我们自以为是的良好用心。有谁居然能怀疑我们不在倾尽所能为别人谋求最高利益？另外，即使是算上德国的全球商业主义，英国和法国也是在世界范围具有政治经济利益（可能有些是幻觉而非真实）的仅有的两个欧洲国家。既然如此，就有很大的舞台可容我们披露彼此的背信弃义。这种状况不太可能改变。尽管在对入侵伊拉克一事及其可能的后果的估计上，法国政府无疑都是正确的，尽管英国政府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失败归咎于希拉克总统也是荒唐且失实的，我还是更多地处于对法国政策进行批判的阵营，例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上。但和许多英国公民一样，我始终是一个热爱法国的人。我也正如一位前大法官埃尔温·琼斯所说的那样，一年没有去法国待上一段时间，就像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一样令人失望。

因此无论是与法国还是与德国比，或是欧盟其他任何一个成员国，我们都自视与其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的优越。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8年著名的布鲁日演讲中坦言，与欧洲的联系已成为“我们历史中的主导因素”，但她和许多人一样在追忆“从未出现过的黄金时代”（借用约翰·梅杰的措辞）。“这片蒙主赐福的土地”（这个双关说法来自雨果·扬关于英国和欧洲的一本代表作的书名，他曾考虑取名为《无神论岛屿》）辉煌地孤立着。相比欧洲的邻国们，英国在自由、议会民主和法律方面有着更久远更深邃的传统；30年的时间里我们曾拯救过他们两次；我们放眼世界，独立自主并具有创业精神。我们十分宽宏大量地宽恕了他们的格格不入。就像弗兰德斯和斯旺唱的那样：

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是最好的，

其余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部分 8.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8）

最近几年，主要是通过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四处演讲，我们大肆鼓吹我们的经济优势。运营不良的欧洲经济被拿来与无与伦比的英国经济相比较。有时我会得出结论，把英国黄金期与欧元区经济体的严重问题作比较，唯一差强人意的回应就是向其提供食物包。英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大多数欧元区国家，比如说我们和法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欧元区有些国家用于贸易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已大大超过我们，相对于联合王国的贸易赤字而言，

欧元区一直保持对英国的贸易顺差。英国的家庭债务及消费已超过欧洲，而这并不总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体现。经济史学家指出，由于戈登·布朗没有挥霍梅杰和克拉克留下来的财产，英国这几年情况已经好多了。戈登·布朗应受到嘉奖。英国的确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及更为自由的市场，因此能够赶超其他部分欧洲经济体。但这不足以成为英国现任欧盟委员彼得·曼德尔森“沾沾自喜”的理由。从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回头看为其所付出的代价，宣称英国的公共服务比欧洲大部分地区优越会损伤公众的信任。或许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一些经验教训。

再回到基本的问题上——我们自视为何许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且对英格兰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所定义的大不列颠性质越来越感到质疑，因此我们自视为英国人这一身份无疑被削弱了。有意思的是，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声称自己卷入这场保卫英国生活方式的激战相伴随的是保守党在苏格兰的地位持续下降，最终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苏格兰销声匿迹了。

英国——大不列颠国家的所有组成部分，不管是分散的抑或是联合的——有着辉煌的历史。我们继承了伟大的思想、政治和文学传统。尽管各届政府没有大力扶持，我们仍拥有实力雄厚的大学及世界排名第二的高等教育体系。陆海空三军虽然战线拉得太长，但仍保持高效的专业化水平。我们的语言已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多最广泛的语言。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英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无论是 BBC 全球服务、英国文化委员会、援助项目、贸易能力还是外交服务，我们都能让人感觉到我们的存在。因此，在《007 系列：雷霆谷》之《你只能活两次》中詹姆斯·邦德对田中老虎说：“或许英格兰已被两次世界大战搞得疲惫不堪（注意用的是英格兰），或许我们的福利国家政策让我们总期望免费得到太多，或许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进行得太快，但我们依然攀登珠峰，在体育赛事上遥遥领先，且抱回诺贝尔奖？？英国人民没有问题。”这些情感有其特定的时代魅力，且并非完全不可取，至少我们不断赢得诺贝尔奖——仅过去的 40 年里我们就赢得了 40 多个诺贝尔奖项，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的诺贝尔奖就比全法国还要多。

我们的麻烦在于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用诺埃尔·科沃德的话来说（无可否认他写了一首关于“伦敦社会的支柱”的诗），即“自然选择了保护我们”，并“坚信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注意到，别的国家都不得不逃离历史的创伤，我们却没有感觉到这个必要。但我们不应陷于自尊的幽闭恐怖症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在阿瑟·布赖恩特《英国和英国人民的历史》一书中，“自由之岛上的公民”永远被“置于银海之中”，我们不能永远地快乐生活。

如果只考虑相关比较中最易于量化的内容，经济数字能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略微领先于法国。很好，但德国却比我们高出三分之一还要多，日本是我们的两倍多，美国几乎是我们的七倍。或许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但是，展望未来，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目前每年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我们的四倍。甚至连印度（昔日英王王冠上的一颗宝石）现在的经济规模也是我们的两倍，且其预计的增长率会快速拉大这一距离。我们注意到，撒切尔和布莱尔任职期间的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远不及 20 世纪 50？？60 年代丘吉尔和麦克米伦政府，也不如内维尔·张伯伦时期的英国强大。我们是中量级的而非重量级的，我们需要认真地考虑考虑这其中的含义了。

在后面的两章中我会论述与此分析直接相关的两个论点。首先是国家主权的问题。这个问题虽未充分解释保守党为何牵扯到政治上的自杀，但已使保守党内部的争议升级。其次是

争论我们的命运是否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应该积极地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大陆邻邦联结在一起。正是这个问题改写了布莱尔先生的历史角色，让我们在温斯顿·丘吉尔曾经称之为“无人问津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中碰得头破血流，在充满怀疑的世界面前申明我们的真诚和荣耀。

国内书面媒体的情况使得这些辩论很难明智地进行。农民埋怨天气或者政治家对媒体牢骚不止都是没有意义的。先不说别的考虑，这种态度会导致粗鲁狭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曾经非常支持欧洲的新闻界却改变了立场，最重要的是所有权的改变。有些报社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在媒体所有权问题上却是例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持有英国护照不是拥有国家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前提条件。先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放一边。我们不应把公众情绪过多地归咎于编辑和媒体业主，因为主要问题在于政治家。记者和媒体业主有多么强悍，政治家就有多么软弱，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政治领导人对媒体业主卑躬屈膝，然而与他们的观点相反，这些经营者并非是政治领域术语的主要制造者。1992 年保守党取得意外的胜利后，人们普遍认为“是《太阳报》赢了”，这主要指的是传媒巨头默多克旗下的报纸在大选中支持约翰·梅杰。但是，我任保守党主席期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整个竞选活动中，该报的大多数读者认为它是左倾的并支持左派。

政治家不应对报纸及其所有者和头条作者战战兢兢，这对于妄自尊大的新闻界和政府议会制度都是有害无利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莱尔先生由于《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决而受迫于媒体压力一样。当然，公投是民粹主义者（当然是在英国）削弱议会民主的手段。我们应就欧洲和大选中我们的欧盟成员资格引发的议题进行辩论。若这些问题——如欧元和宪法条约——像人们说的那样重要，那它们应确定由谁来管理我们。但是这些问题已两次推给所承诺的公决运动，它们被束之高阁以免带来害处。英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若要得到更好、更具建设性的辩论，政治家们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下面我要谈谈没有政治勇气所带来的一些政治性后果以及顺风行船的结果。

第三部分 1.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1）

20 世纪 90 年代保守党的新主意毁了它的前景，将英国拱手让给了缺少原则性战略方向而内部争斗层出不穷的工党政府。这个主意就是完全推翻 30 年前保守党成为亲欧政党时所热烈推行的国际立场。工党在欧盟问题上的立场一直都反反复复：盖茨克时期持反对态度；威尔逊时期多少有些支持；富特时期起初有所分歧随后加以反对；基诺克、史密斯及随后的布莱尔则又一路支持。当其执政或是竞选胜利时，工党总是支持英国在欧盟的成员地位。毫无疑问，保守党应从中吸取教训。然而一些保守党员却锲而不舍地将对欧的一贯政策（更确切地说是态度）强压在保守党肩上，很明显这并未带来竞选的胜利，除非你悲观地认为，若无欧洲的重负缠绕其颈上，保守主义的窘况会更加严峻。

保守党和其他政治组织一样，其中的政策、普遍情绪或政治抗议并不一定需要思想基础。实际上，保守党颇为其虽然反应迟钝但还算很明智的举措而洋洋自得。索尔兹伯里勋爵对伊安·麦克劳德聪明过头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知性主义的排斥，虽然这对大卫·休谟、埃德蒙·伯克（在他们的著作中，柯立芝认为可以找到几乎“一切有关政治真理的真知灼见”）和迈克尔·欧克肖特所遵循的传统略显不公。但对欧洲而言，要想在亡羊补牢式的追根溯源中意外地发现我们的失误是远远不够的。历史进程的变化一定是有原因的——要有理性上的论据。保守党突然发现英国主权在一夜之间被偷去了，就好像知道亚伯特纪念碑被野蛮人搬

走了。我们的主权，也就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已被侵夺，我们必须把它拿回来。

这一发现疾速传遍保守党，而我却置身事外。1992 年经济衰退时期保守党重新当政，过多私房主的负资产成为竞选成功的另一障碍。然而，在约翰·梅杰当政期间，保守党的得票数比其他任何政党在英国政治史上任何时期都多——比 1997 年工党一面倒的胜利中托尼·布莱尔的票数多 50 万，比 1987 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票数高出 30 多万。我们的得票数比工党领先 7 个百分点。不幸的是，庞大的票数并没有带来对等的国会席位上的收获。约翰·梅杰整体上压倒性的票数却只为保守党赢得 21 个席位，而如前所述我并不在其中。我去了香港，把一个热情地签署并声明大力拥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政党留在身后。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保守党几乎没有提及欧洲。

从遥远的中国海岸观看保守党一系列自杀性地轻率对待主权的过程，感觉十分不真实。在香港，“主权”是一个危险的名词。香港是受女王和议会主权管辖的英帝国最后一个重要堡垒。对中国而言，这块土地是被帝国主义者从懦弱的清政府手中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掠夺的领土。若现在他们从广东挥师南下打到新界，朝着粉岭港督别墅及其环绕的高尔夫球场发起进攻，就算是勇猛的廓尔喀军团和黑卫士军团都无法抵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势。这块殖民地上仅有的碉堡里满是沙土。

主权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我们难以让人相信，即使在殖民地也会有市民用某种方式分享总督以他人名义所行使的主权。即便是香港高级公务员，都必须与代表英国政府商谈权力交接的人保持距离，更不用说政治家们。

我任总督期间，还面临其他有关主权的问题。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对冲基金对港元美元联系汇率的攻击。这是转型期里保持殖民地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不愿把香港抛在外海之上，任其在金融风暴中随波逐流。但避免这个命运本身却使我们面临偶然的动荡。随着伦敦、法兰克福和纽约鼠标的点击，上十亿的贸易通货在冲击着汇率。有时我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技术已加速并扩大了每项经济活动，在这样一个全球市场上独立的主权又意味着什么？

香港挺过来了，并成功地完成了向中国主权的过渡。我的家人收拾了行囊，我们登上了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在焰火绚烂中驶离港口进入中国南海。我们加入了英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关闭了新加坡海军基地后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组成的最大舰队。这是皇家游艇（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威尔士亲王也在艇上）最后一次庄严地从舰队中驶过（之后不久”不列颠尼亚号“便退役了——政府认为重修该艇代价过高，况且又想继续修造千禧穹顶）。在海豚、飞鱼及 17 艘舰艇的一路同行下，我们巡游到了马尼拉。在那里，我们受到了菲律宾海军 21 响鸣礼炮的接待（后来得知全是真枪实弹）。随后我们飞回伦敦，在希思罗机场三号客运站排队等候出租车中平淡地结束了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时代。5 年之后我重回故里，此时的政治情形已被新工党的政治巫术和保守党的愚昧无知彻底改变。早前在与一个年轻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的谈话中，我表达了对当前情形的惊惶失措，他说我已失去方寸，的确如此。与此同时，我永远的政治大本营——保守党业已出局。和现在的新故事情节不同的是，以前的结局似乎总会让保守派欢喜，但这种结局现在通常被当做次要因素来考虑。

保守党怎么了？阴谋叛变之后是分裂，分裂之后是自相残杀，残杀之后是战败，战败之后是强加的新正统观念，继而是更多的失败。保守党已不止一次这样的四分五裂。但过去，最大的分歧无非是触动真正经济利益的议题或是对英国世界地位的对立看法。19 世纪 40 年

代中期，保守党在皮尔废除《谷物法》问题上分道扬镳，反对皮尔的乡绅至少还有个理由是为了保住钱财。在此后的 30 年里，保守党有充足的时间休闲，他们只得到 5 年的执政机会。20 世纪初，关税改革将保守党一分为三。支持者们将其视为帝国统一和工业生存这一伟大计划的核心。那么欧盟的成员地位威胁到我们哪方面的切实利益？可与现行政策相提并论的有关英国角色的替代概念是什么呢？——一个可供审查、辩论、争执、选择或者否决的概念？所有我们真正能够紧紧咬住的只是对英国主权不断受到损害的严厉谴责——这些损害也许确实已让主权丧失殆尽。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主权以其不可捉摸而闻名。中世纪时它的位置是分明的，即主权在上帝。皇家或贵族批评家们想必已认真思考过与上帝迟早都要发生的会面，上帝会对他们做出最终不可上诉的判决，其中一些人要遭受教堂墙壁上那些记录的折磨。对于 13 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而言，人类法律来源于神的法律——经由理智或上帝启示。有效的法律是不能由意志行为创造的。

第三部分 2.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2）

后来，在为数不多的几位国王和王子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攻击取得胜利后，上帝变得友好并开始授权了。1534 年英国确立了《至尊法案》，主权归属于”君临议会“，詹姆士一世对此存有异议。在 1610 年的一次国会演讲中，他说道：“君权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国王不仅是上帝的副职，甚至上帝本身也称他们为神。”这种绝对的君主政体自查理一世上断头台后再也没有得到恢复。1689 年的《权利法案》声称：“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虽然君主可以拒绝同意或解散政府，议会拥有实际上的主权。且这一主权不再是上帝意愿的表达，而是反映人民的呼声。

1990 年杰弗里·豪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场研讨会发言中说道，早在保守党政策面临目前的困扰之前，对于主权就有三种定义：第一种是“议会主权”。根据议会主权的观点，英国议会具有法院承认的制定或修改任何法律的绝对权力。我认为这很牵强，因为它既无地域范围也无宪法限制。此种主权议会——至少是非战争时期——能否取消法院或大选？第二种是“主权权威”。它毫无争议但却于事无补地涵盖了国家行使最高权力过程中牵涉到的所有个体——君主、议会、法院和人民。第三种是杰弗里·豪所谓的“国家主权”。他将之定义为“国家对于其命运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力，若他国或外来压力未经许可对本国事务施加影响，就是侵犯了本国主权”。根据这一定义，1975 年的《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允许他国对苏联境内的人权问题表示关注，这显然使苏联的主权受到了侵犯。

杰弗里·豪的中心主张是认为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并不能把握住现实中主权的真正含义。他精确阐述的理念究竟昭示着什么？我们从诸如“议会拥有主权”这样的陈述中了解到什么？有主权能做什么呢？是维护我们的空气质量或是维护“权杖之岛”上的“蓝色大陆”吗？是要重新采纳在美国市场上的贸易保护措施吗？是出于无论如何去说都是虚伪或者欺骗的原因防止英国加入对伊战争吗？是对内阁和首相实施问责吗？“主权”这一概念之所以变得如此麻烦是因为混淆了法律上的主权——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它的定义常常会挑战我们 50 年的政治史）和事实上的主权——也就是引导人们采取理想的行为方式并在唯一合适的层面上处理困扰每个民族国家的问题的能力。

哈士伯深谙其区别。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的第一场，格伦道尔对他说：“我能召唤地下的幽魂。”“哦？”哈士伯答道，“这我也会，什么人都会。可是当您召唤它们的时候，它们

果然会应召而来吗？”而我喜欢的历史案例在晚些时候发生在另一个国家。1793 年，在罗伯斯庇尔的怂恿下，法国雅各宾派与较为温和的吉伦特派反目成仇，并强烈要求逮捕吉伦特派的领袖。他们把大炮推到了国民公会的门口，以强调参与民主制下的卢梭式主权。国民公会主席声明了自己至高的法律权威，传话给等候在外的武装基层民众“无套裤汉”党人，要求他们结束对里面选举的胁迫。这群暴徒的领头人回话很简单：“告诉你他妈的主席，他和议会去他妈的吧，如果一小时内不把那 22 个人交给我，我们就把他们全部炸死。”代表们试图逃跑，但每个出口都被封堵了。因此他们又回到了议院，行使其主权的法律权威将他们的同僚抓了起来。

英国不愿面对理论和现实的差距，这或许暴露出我们对自身重要性的幻想，而这又反过来体现在我们对自身被统治方式的不切实际的看法上。与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不同，我们没有成文宪法，因此现在我们鄙视任何试图用详细的条约语言说明在欧盟中分享主权的方式的做法。在宪法条约还活蹦乱跳时，许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在历史上首次为宪法所驾驭。我们不需要这种欧洲大陆的机制。我们是自由的个体，我们的自治体制已经由撒克逊时代的橡子成长为一棵茂盛的橡树。在赞扬威斯敏斯特的议会政治、议会主权、我们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标榜的公民社会时，我们实际上在忍受什么？我们尽显不公的选举系统，政府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重组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受到行政部门抨击的法院法官们（因行政部门对法院捍卫公民自由的方式不认可），在工党和保守党统治期间都显示出海尔什勋爵称之为“选举独裁”特性的行政部门，被狂热的中央集权所摧毁的地方政府（我起了不光彩的作用），从被选出来履行职责的人手中将责任骗走的半官方机构，人民对削弱议会赋予其权力的公决的支持？？即使欧洲大陆的攻击在发生，难道这些真的是民主政府需要保留和保护的进行自治的神圣工具吗？

或许四五十年前当我们首次面临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后果时，这一争论更有意义。支持加入欧共体的人坦率承认加入的后果，他们没有误导但无疑也没有夸大宪法的影响。当时的大法官基尔穆尔公开告知上议院，法院和议会在新的世界中仍会运作，在《罗马条约》所涉及的事务上，英国法院有义务服从欧洲法院。与之前加入北约或联合国相比，这意味着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它是契约性的，是“史无前例的一步”。在私底下给政府首席谈判代表爱德华·希思的信中，他谈的更深。他认为对宪法的反对虽然“严重”，但“不是决定性的”。议会在一个重要领域的实质立法权发生了转移。他归结道：“我确信低估反对派力量是个大错误？？但反对意见如今应公布于众。若我们在这一阶段试图加以掩盖，这些反对加入欧共体的人无疑会抓住这一点并在以后产生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对支持加入欧共体的人的指控不在于他们掩盖了所涉及的事物——就像前面引用过的爱德华·希思 1966 年的评述，而在于他们没有积极采纳这一明智的建议，我想部分是由于他们也还禁锢在对英国完美自治体系充满柔情的幻觉中。

第三部分 3.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3）

从成立伊始起，欧共体（如今的欧盟）一直都有立法权，其法律对所有成员国的公民有约束力。对这一点也一直有激烈的争论与反对。德雷克·沃克－史密斯认为，英国公民丧失了他们与生俱来的部分权力，包括一些“英国人民深有所感的、本能接受的及传统上珍视的东西”。1962 年盖茨克声称，加入欧共体“意味着英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终结，也意味着千年历史的结束”。这番话代表了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的观点。最近我们常能听到此类言论，可让人“惊叹”的是尽管 40 年后英国仍然是英国，当时反对盖茨克的人却转身附和这些观点，

而盖茨克本人想来一定会被今天获得如此多的惧外症门徒的信奉所吓退。

英国在 1967 年就加入欧共体发布的白皮书中宣称："宪法改革就是提前接受将来由欧共体机构所颁发的条令成为联合王国法律的一部分——这在英国是史无前例的。"4 年后，在解释成员地位的谈判内容时，另一份白皮书更加忸怩作态地声明不会"侵犯根本的国家主权"。这就带来了好几个问题。当然"根本"这个词本身就含糊其词。最重要的是，它回避了虚拟与真实的问题——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是的，我们是要放弃某些理论上的权力以求在别的方面得到实际的权力。早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英国不愿参与建立欧共体的活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希望能维护国家主权。欧洲其他国家联合它们的力量，成立超越国家的机构，这没有问题——的确可能会是一件好事。但英国必须是"其命运和灵魂的主人"。放肆的外国人可能会采用越来越多的"联合式"的做法，但我们要保留我们的童贞。但那时的不介入，寻求维护法律上的主权真的使我们事实上的主权达到最大化了吗——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把握得更紧了吗？显然没有。由于我们拒绝加入，我们眼看着欧共体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成立并按照某些与我们背道而驰的原则发展。身处 20 世纪下半叶统治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结构之外，我们在欧洲毫无前途可言，会沦为无足轻重的国家。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我们敲门了，但戴高乐拒绝了。我们不得不请求加入。结果是我们加入的条件比 15 年前不利得多。

在 1991 年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时候，法国的争论中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反对者要求"货币政治独立"——法律上的主权。但坚挺的法郎已经属于德国马克区，因此通过接受单一货币就可以使事实上的主权最大化。虽然德国央行只考虑德国的利益，但法国在欧洲中央银行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欧洲央行必须考虑其利益。这实际上便是整个欧洲项目的逻辑所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通过分享法律上的主权来获得事实上的主权，从而对它们的命运具有更大的掌控权。

这就是 1971 年的白皮书中所描述的进程，即"基于总体利益上的单个国家主权的共同分享和扩大"。这必定导致丹宁勋爵所描述的另一进程，他说："就像倒灌的潮水一样，它流入河口，沿河而上，无法阻挡。议会已宣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此以后成为我们法律的一部分。"杰弗里·豪指出，这个比喻在只关乎英国的问题上设想了"一片不可被潮水缩减的陆地"。的确如此。只有我们愿意实行并且认为共同政策的广泛实行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利益，共同体法律才能得以实行。

为什么这总是显得如此具有入侵性？原因很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使一个单一市场运行，就必须排除一切障碍，这就牵涉到复杂的立法干预。部长们花 20 多年的时间考虑除草机噪音方面的指令，其原因就在于噪音条例可被滥用为非关税壁垒。稍微夸张一些，如果我作为英国除草机生产商要将产品卖给法国，那么我会有什么发现呢？毫无疑问，我的除草机会违反了几十条法国条例。要么油漆中包含着禁用成分，或者绿色颜料不合格，要么发动机声音过大，还有安全隐患。每台机器都必须在佩比尼昂进行检验。此外，还需要转变刀片逆时针的切割方式，因为这与法国自古以来的顺时针切割方式相悖。除非你是一个急于推销产品的除草机生产商，否则就会觉得荒唐至极（当我考虑这个例子是否有点牵强时，我听到一则广播，英国的活动房居住者抱怨欧洲立法没有规定用什么材料来制造欧洲房车的沙发）。

因此我们需要法律——英国已远离欧洲大陆的惯例数百年，且得意于自身的与众不同，但现在却不得不遵守这些法律。每个成员国都必须遵守。每一次我们支持这些包括从环境污

染到金融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把主权当做英国人神圣而绝对的权利，与生俱来（套用沃克－史密斯的话），像神圣的火焰一样代代相传，看不见摸不着但不可变更，那么每项欧洲议题都不得不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即这个摆在谈判桌上的提议是否要求英国公民放弃他们更多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么说来，英国正在一点一点地放弃自己，"一步步逼近毁灭的边缘"（引自 2000 年保守党的小册子）。

保守党领袖中对此"毁灭"推波助澜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她赞成《单一欧洲法令》，参与了谈判，并于 1986？？1987 年间确保其得到立法通过。如果说上述的主权放弃是用切意大利腊肠的方式——这里切一片，那里切一片，那么《单一欧洲法令》则是砍而非切。我们放弃了大片的议会自主权。这是一个卓越事业的组成部分，而且遵循了同样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在 1975 年公民投票竞选活动的演讲中所提出的睿智见解："几乎每个大国都迫于战后世界压力将重要领域的主权联合共享，以此创造一个更为有效的政治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努力争取达成我们主要的国家目标，即将关税同盟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单一市场。

第三部分 4.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4）

只有极少数的保守党人为主权而不断斗争。议会不顾少数人的反对促成了《单一欧洲法令》的通过。保守党总体来说始终带有丘吉尔智慧的印记。在关于超国家机构经营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初期计划的一次议会辩论中，这位昔日的英雄曾说："我们面临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为了更大程度的联合，你们愿意在任何情况下放弃任何程度的国家主权吗？"保守党和自由党都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愿意给以考虑，并在能够被说服的情况下接受废除国家主权，只要我们能够对条件和保护性条款满意？？我们宣称国家主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但为了世界上全人类找到一个共同的家园，它绝对可以缩小。"几乎我们所有的保守党人都这样说，直到后来某个时间某件事情的发生让一系列荒唐行动变得更加难以捉摸。

玛格丽特·撒切尔其人及其观点渗透在保守党内部及英国有关欧洲问题辩论的方方面面。她是个杰出的人物，事实上对她的评价根本找不到中间立场。对她非爱即恨，不是极度的崇拜就是疯狂的斥责。她改变了她所接触到的大部分事物，不甘心当政期间碌碌无为，决心留下痕迹和影响——也许用"制造痕迹和影响"会更准确，因为我相信她没太多指望在后撒切尔时代仍然被追随。丹尼斯·希利曾评论道，她是棵遮天的大树，在其茂密的浓荫下长不了多少东西。

虽然个性善良且毫不挑剔个人举止——和许多女性一样习惯男人的脆弱，但她却是一个政治上的强者，了解政治领导中让人产生恐惧的重要性。她习惯在会议一开始就总结出结论，那些想让她偏离所选择的政治路线的人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此外还要对所讨论的议题至少拥有和她同样多的知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她执政的最后几年，那时，她由于疲惫不堪，已失去了浏览摘要的热情。她的同僚都以各自的方式试图与她"与生俱来的力量"相处。彼得·卡林顿私下里向她表明不愿在会议上被大声斥责，她接受了。杰弗里·豪选择耐心（至少他是这样）、轻声的辩论。看到他一次又一次以彬彬有礼的方式应对她混乱的思维，感觉有点儿像一位乡村律师痛苦地面对一个难以对付且咄咄逼人的客户。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职业生涯说明了很多问题，至少证明了政治中思想的重要性。她从不满足于在前些年社会民主遗留下来的领地上进行政治战争。她想把政治战场向右转移（她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里，她可以自如地支持更低的税收、更少的规制、

扩大私有化及限制滥用工会权利。她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明确叫做“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哲学，“主义”是其所作所为的集合。铁路私有化被认为是“撒切尔主义”政策。但我怀疑她是否真的在实行“撒切尔主义”——因为它杂乱无章且可能十分不受欢迎。她青睐宏伟蓝图，但始终小心从事（直至最后），反复求证并做好基础工作。例如，在所有成功必备因素就绪之前，她拒绝了与矿工的斗争。

伴随宏伟蓝图的是简单明了的叙述和阐释。和罗纳德·里根一样，她知道大部分人对政治的兴趣微乎其微，对单个政治家的立场知之甚少。如新马克思学派曾指出的那样，她设法编造了一个至少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之外令人信服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她对国家认同方面的一些直觉有助于让人接受一个更小的国家。她的国家观念就是鼓励私房主和小企业、减轻税务负担、放开企业、大量削减政府开支（但只停留于言辞而非实际）、军队和警察拥有最高尊严。这一观念从政治上表明了英国是坚定个人主义者的国度，这些个人主义者遵纪守法，敬畏上帝，明白事理，一丝不苟，抱怨议会政治的啰嗦，爱国，时刻准备着放下犁头并拿起刀剑来解救那些靠不住的邻居。她手提包里的纸片上写着一些圣人先哲的至理名言，通常会有一些出自拉迪亚德·吉卜林之手，可能是《花园的荣耀》或者《诺曼人和撒克逊人》：

撒克逊人和我们诺曼人不同，其言谈举止不如我们谦恭。

但是除了正义和权利，他说什么都无足轻重。

若他像公牛般站在犁边用阴郁的目光直视你的双瞳，

嘴里嘟哝“这不公平”，

孩子，别惹他。

这就是撒切尔的叙述，虽然她看起来对历史知之甚少，但至少对我们这个岛国历史的一个简单版本有真切的感受。

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是位幸运的政治家。诚然，成功政治家的幸运某种程度上是自己造就的。不论是她于 1975 年介入保守党领袖大选并把男对手们一网打尽，还是托尼·布莱尔 1994 年在北伦敦饭店对戈登·布朗巧妙的扼杀，都说明如果要取得成功，政治家们必须抓住时机。像布莱尔一样，她碰到的对手不是很强。在适当的时候，她会让对手像兔子陷于汽车大灯的光圈那样不能动弹。20 世纪 80 年代，工党在欧洲问题、国防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程度上都存在分歧。极端分子渗透进工党中，将许多活跃分子一鼓作气地驱逐出政坛。几位最受欢迎的领袖脱离了该党，并开始重建新的政党（一个未成型的新工党）。玛格丽特·撒切尔充分利用了工党这一混乱局面。当约翰·梅杰生平第一次作为政党领袖参加竞选时，尼尔·基诺克让一套对保守党明显不利的选举制度死灰复燃，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在边际席位上开始了微妙的投票竞争。这使梅杰的胜利更加引人注目，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胜利只给保守党带来了微弱的议会多数。作为一位政治领袖，梅杰不如其前任那样受宠。

如果撒切尔明智一点的话，她在幸运连任两届后就应该让位给后来人。但很少有政治领袖能像西班牙的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那样明智，只给自己两届的任期。再想想布莱尔先生吧！随着政治保鲜期的缩短以及越来越眼花缭乱的曝光使领袖只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保持吸

引力，他们应学会见好就收，激流勇退。

第三部分 5.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5）

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支持连贯性，讨厌意识形态，视政治为次要活动，并赞同团体的和谐感。对他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的人必然会感受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带来的强烈冲击。公平地说，这是英国当时所需要的，我个人也因此对她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在1979年，连贯性和共识意味着什么？英国政府的任务已转向应对衰退，吉姆·卡拉汉曾用温和的手段来应对，但被不负责任的工会行为所干扰，这种行为也是引起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英国变得已几乎无法治理。在20世纪70年代，工会支持政府，后来又推翻了政府。这段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政府和工会之间寻求达成某种难以捉摸的“社会契约”。根据这一契约，政府将承诺给工会一些永远不该给的礼物，以此换取工会从未打算履行的承诺。英国需要猛烈的冲击。作为一个保守的社会（不是指保守党执政），英国或许也需要一个无视之前达成的所谓共识并大声疾呼的领袖。国家做出的回应是犹犹豫豫地朝撒切尔的方向迈了几步。有意思的是，许多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睿智开明之士认真听取了她的见解。彼得·詹金斯以前就描绘了英国的衰退，他认为我们必须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否则相对的衰退很容易变成绝对的衰退。雨果·扬强烈反对撒切尔过度的民族主义，但对其严肃认真和有原则性表示认可。她总的来说确实如此。尽管撒切尔政府早期的政策过于强烈地挤压了整体经济甚至于一些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由于在野时制定的政策在执政中得到严厉地推行，同时发生的国际油价三倍上涨似乎被忽略），但是减税、政府开支紧缩、国企私有化、工会改革和撤销市场管制等措施共同发挥作用使经济发生了变化。虽没创造经济奇迹，但却为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尽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始终不及邻邦们显著。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能够再次施政，我们把束之高阁的有关市场、税收、激励和竞争的种种想法解救了出来，这些想法已被政治潮流尘封许久。当托尼·布莱尔还是一个怀揣工党章程第四条款（承诺实行国有化）并且翻领上带有核裁军运动徽章的年轻工党候选人时，撒切尔的所作所为使这位工党领袖采用今天的观点来领导政党并管理国家成为可能。她所遵循的原则为他（多数情况下）富有技巧的机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大体来看，撒切尔无疑是个“好现象”（借用塞拉斯和叶特曼在《1066 年及其他》中的措辞）。无论公开或是私下里，我经常与她意见相左。很多事情她都做得不对。她对制度多元化漠不关心，强烈攻击地方政府，忽视我们著名大学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财政困难。她看不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重要性，厌恶 BBC，尤其憎恨它那绝妙的全球服务，这令她的一些外国朋友如肯尼亚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感到愤怒。她对苏格兰没有感情，使用非常典型的英格兰词汇来定义她眼中的英国特质，因此惹怒了边界以北的选民们，而且他们渴望自治的愿望也被她拒绝。她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棘手问题上也同样的粗暴，虽然她于1985年勉强签订了《英爱协议》，这一协议为十多年后北爱尔兰问题政治上的最终解决指明了道路。尽管如此，我个人还是喜欢她，并在政治上钦佩她，对于她偶尔笑称我“缺乏胆量”也处之泰然。她比其私下圈子里的大多数人都令人愉快，除了有一两个人例外（如戈登·里斯和罗尼·米勒），那些人都是她极端观点的应声虫。

撒切尔在野期间的演讲并未过多地提及欧洲。作为政党领袖，她在首次议会演讲中攻击针对欧洲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在公决造势活动中鼓励投赞成票，偶尔呼吁更紧密的欧洲团结，尤其她在面对苏联时更是如此。执政期间，她带着毫无外交策略可言的热情和直指目标

的迅猛投入了缩减预算的辩论，这令其同事深感不安，也引起欧洲其他领导人的轻蔑。她大都如愿，即使施以更大的技巧，取得的成绩也不一定就会更好。她接受了《单一欧洲法令》，向经济政治一体化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她与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总统相处异常融洽，却与德国基民党的科尔总理关系不好。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则时好时坏。她不是联邦主义者，在接受进一步欧洲一体化之前总要认真推敲其理由。但越来越多其他欧洲领导人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是联邦主义者，他们经常去做礼拜，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相信上帝。不幸的是，在一体化浪潮最猛烈地冲击欧洲的时刻，她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太惹人注目。如克努特大帝一样，她责备浪潮，并且她的追随者至今仍是如此，虽然这一浪潮早已停止往前推进。

玛格丽特•撒切尔于 1988 年 9 月在布鲁日的演讲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作为激进分子外加社会主义者的欧洲委员会主席决心通过单一市场在“经济欧洲”之外寻求“社会欧洲”，受这一事实的刺激，又考虑到其他国家在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巩固单一市场方面步调惊人的一致，撒切尔决定将其思想毫无保留地展示给欧洲大陆。这非常有效，因为这是撒切尔第一次批判制定政策的布鲁塞尔机构，而不是欧洲政策本身。用她的话说，布鲁塞尔对英国利益有潜在的敌意。从本质上讲，英国与欧洲打交道的传统立场是，在恰当的议程基础上达成适当的联合，以此来扩大英国的影响力。转瞬之间，这一传统立场被打破。布鲁日演讲带来了一个至今仍萦绕保守党言论的噩梦——超国家即将到来。这样，国家主权被赞颂，而社会主义被践踏。这些颇为有力的东西随后被媒体极力放大。但撒切尔的主要论点迅速过时，我们不妨看看她在个人回忆录中特别提到自己的那三段话。到 1993 年回忆录出版时，就连它的作者本人都感觉到其立场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一开始，撒切尔提醒读者，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并不是欧洲身份的唯一表现。在其东边，其他国家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他们的经历值得我们大陆西边的人学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曾经用中央集权控制一切的如苏联那样的国家正逐渐认识到成功依赖于分权时，欧共体的一些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英国我们没能成功地恢复国家的边界，结果却发现在欧洲层面上又强加给我们新的边界，一个欧洲超国家在布鲁塞尔支配着我们。”

第三部分 6.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6）

她继续说道：“独立主权国家之间自愿且积极的合作是创建成功欧共体的最好途径？？欧洲将会更加强大，恰恰是因为法国就是法国，西班牙就是西班牙，英国就是英国。每个国家都保持了自己的习俗、传统和个性，让它们服从某种统一的欧洲个性拼图是愚蠢的。”在作最后总结时，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让欧洲成为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各个成员相互了解，彼此欣赏，互助合作，但不要为了共同的欧洲事业忘却原来的国家身份。”

玛格丽特•撒切尔所称赞和帮助过的大多数国家（不包括俄罗斯和昔日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都予以了回应。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赞扬她在他们争取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所给予的支持。但他们取得了主权之后又做了什么？他们申请加入欧盟。他们当时是否自知正放弃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身份来服从一个欧洲身份？他们是否相信已把莫斯科代表换成了布鲁塞尔代表？欧洲是各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的确如此，在我们大陆以内的民族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如我后面的章节将要谈到的，民族国家是始终维系公众忠诚和感情的核心。这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大家庭的共同点是什么？几乎每个成员都已是欧盟成员，或者希望成为其中一员。2004 年 5 月欧盟的扩张最有力地回绝了布鲁日的观点，但同时也解释了玛格丽特•撒

切尔预言的恐惧没有发生的原因（将来还会有进一步的扩大）。民族国家用独一无二且史无前例的方式联合或分享其主权但却没有放弃其国家身份。他们意识到，如温斯顿·丘吉尔于 1948 年在欧洲大会上所陈述的那样，“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需要牺牲或合并一些国家主权”。正像丘吉尔随后所说，他们相信这种牺牲可以被看做是“所有涉及的国家逐渐承担更大的主权，而这个联合的主权能保护各个国家传统中形式多样且与众不同的习俗和特征”。

布鲁日演讲标志着撒切尔时代最后一个行动的开始。之后便是撒切尔与其同事就英国是否应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而展开的激烈争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首次讨论时，大多数人都赞成这一路线，其中包括保守党主席诺曼·泰比（他后来成为最为紧张的怀疑论者）。再后来是关于德国再统一问题的争吵——一个曾经的主权国家重新结合。此后不久，1990 年罗马峰会中关于货币联盟的协定被玛格丽特·撒切尔嘲笑为“通往乌托邦的旅程”。但令她的批评者略感安慰的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于三星期前最终同意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当然太迟了，且其汇率令人堪忧地毫无竞争力）。然后灾难发生了。从罗马归来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去下议院汇报之前发生的种种，谴责欧洲及其行为和浮华。“不？？不？？不？？”她声嘶力竭，吵闹声大得让忍受已久的杰弗里·豪终于按捺不住，从内阁中愤而辞职（他对她在罗马宣称的英国将永不采用单一货币尤为不满）。随后她面临着迈克尔·赫塞尔廷的竞选挑战。在第一轮投票中，玛格丽特·撒切尔没能让他出局，然后麻烦来了。在此郑重申明，我在第一轮投票中把票投给了她。内阁成员一个一个被叫去给她建议在遭受挫败后怎么办。我告诉她其地位已不稳固，即使第二轮投票能侥幸通过（这一点根本不肯定），结果也只是耻辱。我说她应该有尊严地辞职。最后我告诉她，若她无论如何都要硬着头皮撑下去，那么下一轮投票我不会再支持她，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她继续执政，保守党就会分裂。她有礼貌地听着，但很少说话。我相信肯尼思·克拉克也对她说了大致相同的话。

考虑到欧洲别的地区当时的情形，国家主权的提升及对主权共享的污蔑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全球形势在此后发生的变化回首起来，这种观点也是背道而驰的。据说当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看到一个他没什么时间来挂在墙上的画像时，他命令道：“Niedrigerh？ngen（挂低一点）。”在相互依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要的时候，这对保守党及其他人而言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似乎是个不错的建议。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谓的全球化进程及其影响愈演愈烈——市场的开放力度比 19 世纪更大，而科技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 20 世纪最后 20 年里，世界外汇市场的流通量就提高了 50 倍。在最后 15 年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16 倍。在其名为《完美大未来》的书中，约翰·麦克雷斯维特和艾德里安·伍德里奇写道：“1990 年，世界上仅有 37000 家跨国公司及 170000 家分公司，然而截止到 1998 年，跨国公司已增加到 60000 家，并且有 500000 家分公司。”货币、商品、旅游及技术跨越了国界。后面我还将谈到这一点。这里我们只要注意到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繁荣和安全这两个人类最关心的问题就足够了。甚至像英国这样的岛国都发现，在抗击毒品、犯罪、环境威胁、非法移民、流行病和恐怖主义时，边界是无孔不入的。这就是为什么要通过主权共享而相互依赖，也是为什么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其他国家在留意并效仿我们在欧洲开辟的合作方式。不管对于民族国家还有什么高见——我已经承认它在激发人们的忠诚和热情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我们很难得出这一结论：在 21 世纪初，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构成明智的国内国际政策的基础。

为何过去大约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些论点对保守党不起任何作用？为何保守党的欧洲观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并使其前景凄凉？为何保守党人否认撒切尔实施的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侵蚀国家主权，通过自由贸易、开放经济和竞争建立起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为何他们

对其经济自由主义在欧洲产生的后果感到恐惧？为何保守党在 1992 年到 1997 年间如此持续不断地努力使自己不能当选，然后一遍遍地要着卑鄙的手段？我们不得不回到玛格丽特·撒切尔被民众抛出政治舞台这件事上，正是这一行动解释了保守党作为一支可靠竞选力量的急剧瓦解，我们保守党人将继续在竞选中备受煎熬直到能够消除它的影响。乔克·布鲁斯·加戴思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一位朋友和追随者，他来自苏格兰，是一个聪明的下院议员（当然不是在她执政期间一位有苏格兰席位的下院议员)。他曾说过撒切尔能拯救国家但会毁掉保守党。他还说将要发生的结果都是国家和政党应得的。现在到了保守党对其预言提出挑战的时候了。

第三部分 7.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7）

下议院中一部分保守党议员要求当政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下台，因为他们不相信在她的领导下保守党能赢得竞选，并且认为她的古怪行为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且具有破坏性。她的离职当时看来并不是弑君者的灾难性行动，但事后却带来严重后果。我本人也不认为她能领导我们赢得竞选。但我们是否无论如何都应遭受一下失败，然后指望早点重掌政权？我个人对此并不确定。自 1987 年竞选以来，我就一直认为下次我很有可能会“完蛋”，并拒绝了转向另一个更安全的席位，在我看来这是讨厌的利用不定局势谋利的行为。但无论个人境况如何，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围绕竞选失败的可能性开开心心地制定策略。政治上太过聪明从来都不是明智之举，通过失败策划下一场竞选胜利显然是愚蠢的。因此这群人攻击其领袖并不奇怪。

但这位领袖与众不同。玛格丽特·撒切尔作为第一位从该党右翼出来的领袖，其任职的时间之长令人难忘。此外，她给右翼信心，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成见和观点与国家特征和利益息息相关。她并非要控制他们的本能，而是放松了控制，让他们运用自己的头脑。第二，她还吸引一批媒体界的理论家组成了执政官卫队，其中几位是左翼转来的皈依者，对她而非对保守党本身尽忠。第三，通过布鲁日演讲及后来的所作所为，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动用了自己大笔的政治资本使保守党在欧洲问题上持更明显的批评姿态。这个问题加速了她的倒台，但她的下台留下了一批支持者，对他们而言，任何在欧洲问题上的反抗实际上都是对她的忠诚的回忆。

约翰·梅杰当选并入主唐宁街 10 号，在竞选中他被认为是最接近撒切尔立场的候选人。或许他确实如此。我一直帮助支持道格拉斯·赫德参加竞选，他的聪明才智总是让我钦佩不已。我不确定他在此次短暂的竞选中有多尽心。他不喜欢竞选中的一些粗俗行为，这也是我很欣赏他的一个原因。但不管怎么样，约翰最终在国内掀起了风暴——他似乎同时代表着传承和变化。

梅杰一向不是撒切尔的追随者。在我们都是年轻的后座议员的那些日子里，我记得我们的观点大体趋向一致。他是个温和的保守党人，经济问题上强硬，社会问题上宽容，且能力非常之强——他是我们那代政治家中最优秀的。也许最让撒切尔高兴的是他不圆滑，没有在公立中学和牛津、剑桥学习，不是布鲁克斯或怀特俱乐部的成员，不会在特权、内疚和抱负的影响下观点摇摆不定——今天是撒切尔的支持者，明天却是个反对者。我怀疑撒切尔是否真正了解他。但她知道，梅杰每次都很好地完成了她交予的任务，而且他的极大优势在于他就是他——不是赫塞尔廷或豪。

约翰·梅杰也不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两人如果并行可能早已令人筋疲力尽。她驾驶着政府这辆车以危险的速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和险弯处疾驰，而他却回归到更为传统、更为节制的执政方式。奇怪的是，政府快速运行时在某种程度上结合紧密的机构却开始分崩离析。梅杰担任首相 7 年，对他而言这是郁闷的 7 年（至少从 1992 年起），虽然期间有一段时间（后来的）经济管理非常成功，但最后以可怕的失败告终。因此思考一下他该对保守党的不幸结局承担多少责任是有一定道理的。

约翰·梅杰是个好人，有时这听起来像是批评。但做好事总比做坏事强，和善总比让人讨厌好。更准确地说，约翰·梅杰绝对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也是我在政治生涯中见过的最好的首相。我说的“好”是什么意思呢？他诚实、慷慨、善良，总是把别人往好处想。马基雅维利会反对我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政治领袖应该和善。梅杰也是个很聪明的人，比他自己认为的要聪明，一般人也不认为像他这样只受过很少正式教育的人会如此聪明。他任财政部首席大臣时，其他部门的大臣常需与他商谈年度预算的问题。这样的会议总是令人生畏，是对大臣是否尽职的考验。梅杰总是很有礼貌地征询他们是否愿意不经由公务员顾问而直接和他面对面商谈。一次在一个贴满其前任照片的接待室里等候这样一次会面的时候，我问一个高级财政官员：“他们中谁最好？”他手指向梅杰的门，回答道：“那位。”高中肄业，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这一切并未削弱梅杰的智慧，只是他对自身的学术权威和社交技巧不太有信心。他避免对他人进行居高临下的批评，也自知不应如此。如果他脸皮再厚一点，再无情一点，愿意用他一跃而成为政治明星的现实背景做交易，他可以更快乐一些，而且很可能成为一个更成功的首相，但这样我就不会如此喜欢他了。

约翰·梅杰热爱保守党，至少是热爱他对该党罗曼蒂克的想法。对他而言，保守党既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阶梯——这个阶梯将其从布里克斯顿的银行和文员工作岗位带到了唐宁街，成为自 19 世纪自由党罗斯伯里勋爵以来最年轻的首相。他坚信至关重要的是保持保守党的团结，避免分歧和分裂，并通过团结取得成功（而迈克尔·赫塞尔廷的支持者却说他是通过成功促成团结）。问题不在于梅杰极力促成保守党的团结，而在于该党不想团结，命运使其获得 1992 年大选的胜利，这也给叛变者和捣乱者带来了对他们最有利的结果。

我已提到，梅杰在马斯特里赫特谈判中运用了他娴熟的技巧。那些日子他非常喜欢在欧洲开会。这些会议是展示其技能的橱窗——他比在场的其他人更懂得把握细节，他总是礼貌而坚定地争论，他对充分理解身体语言十分自信，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想要什么和能得到什么。在马斯特里赫特实现的一个目标后来却让他困扰。通过谈判他使英国脱离了所谓的社会条款，因为迈克尔·霍华德及其他人一再坚持社会条款会成为捆绑在富有竞争力的英国工业脚踝上的锁链。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1997 年又加入社会条款后，似乎并未以任何明显的方式阻碍英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保守党右翼中的欧洲怀疑论者和更多主流的保守党员来说，社会条款是个令人厌恶的东西，因此不得不抛弃它。

第三部分 8.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8）

1992 年大选期间，“几个月前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期间，欧洲似乎很重要；但在此次大选中，欧洲并不引人注目。一旦大选结束，没有什么比欧洲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了”（引自纳菲尔德定期的《选举研究》）。由于在议会中占有微弱多数的 21 个席位，保守党的反欧洲派通过调动所有关于超国家和英国主权丧失的观点来破坏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进程。他们直接反对通过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法案。最初我们认为大概春

季大选前议会能通过这项法案，但梅杰和我（作为保守党主席）一致认为这也许会限制大选时间的选择。在这项法案于夏季提交到下议院时，反对者以丹麦人在其全民公决中对此条约投反对票为由，坚持推迟议会审议。要命的是，他们的提议被采纳了。等到议会辩论继续时，英国已在 9 月份遭受了被汇率机制拒绝的耻辱。回过头看，很容易找出我们在汇率机制问题上的错误所在。我们加入得太晚了；我们的汇率毫无竞争力，且由于德国再统一的成本由整个系统承担，英国汇率愈发没有竞争力；英国笨拙的财政外交政策和德国固执的不妥协态度消除了再结盟的任何可能性。不久后，尽管德国帮助法国摆脱了困境，而法国则因为自身困难重重未能帮助英国脱困。那个时候，梅杰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公开指责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对此事件和其他事件的处理。但我怀疑任何保守党财政大臣是否有能力逃过此劫，这次灾难将政府有效管理经济的名望席卷殆尽。任何政府所拥有的最可贵品质便是“疑狱从轻”。随着汇率机制的崩溃，梅杰政府失去了这一品质，此后的分裂和争吵使得这一成功的关键因素再也没有恢复。

“黑色星期三”混乱的财政危机使得反欧洲主义者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利用马斯特里赫特立法接二连三在议会危机中跌跌撞撞的时机趁火打劫。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爱德华·希思还能够呼吁两党联合支持，使有关入盟条件的立法在议会通过。每到关键时刻，罗伊·詹金斯会带领一些亲欧的工党成员进入政府大厅。但现在亲欧的工党成员不再给予这样的支持。他们以退出社会条款为由，竭力恶化政府的尴尬局面。保守党的叛变者与工党的党鞭联合起来，一有机会便破坏政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法案虽然最终告一段落，但并没有让人松口气，也没有给人恢复正常的决心。保守党政府一路撤退，叛变者（如保守党后来的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穷追不舍，纠缠大臣并使政策进一步朝着欧洲怀疑论的方向倾斜。这一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大选，并最终导致保守党惨败。

几个因素让下滑的保守党雪上加霜。议会中的保守党总体上对政策并非十分感兴趣。同时，认为通过鼓励对欧洲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就能让大多数人头脑清醒，这种想法也许本身就是个错误。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产生的稳定人心的影响——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常识底线——基本在汇率机制灾难中丧失殆尽。这使得反对欧洲的观点似乎是全面正确的。此外，下院议员和党派激进分子读的报纸促使他们在反欧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20 世纪 70？？80 年代早期的亲欧政策中，工党中的温和分子在媒体的支持下曾经一度如此。保守党内亲欧派中的温和分子发现自己正在对抗媒体主流。无论在那时还是后来，保守党都承受着在不断缩小的政党中实行民主化的后果。随着保守党成员日趋减少且日渐老迈，他们也越来越反映保守党人所读的右翼报纸主笔的观点。右翼偏见的交流形成恶性循环。日趋增多的反欧者和右翼观点意味着更少的党派激进分子，而更少的党派激进分子又意味着反欧者和右翼观点的增多。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在任何选区做一个温和的亲欧保守党议员都很艰难，任何公然持这一观点的人都几乎不可能当选为议会候选人。

这种情况下保守党的管理受到了批判。有人认为，如果梅杰及其同僚强硬对待这些批评，情境不会发展得这么糟糕。但这样做并不容易。不可理喻之人、心怀鬼胎之人和野心勃勃之人都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是长期反对欧洲的人；有的是新成员——所谓“撒切尔的孩子们”，他们私下经常受到政治老太太的鼓励，通过投票反对政府表明他们的原则；有的是当大臣很失败，但等到解职时才良心发现的人；还有的是从政 13 年后感觉一无所得的人——政见不同源于幻想的破灭。经过长时期的执政，任何政党都会积累一些对其不再抱有幻想者。管理政党绝非易事。梅杰总是很担心万一他过于强硬就会冒险，像皮尔一样把政党搞得四分五裂。他可不想因搞垮政府而遗臭万年。

麻烦在于一旦与极端分子开始讨价还价，一旦为争取时间而拖延，下滑的陡坡便出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可能会从手提包中掏出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她最喜欢的吉卜林的诗行：？？我们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

一旦向丹麦人交纳了赎金，

你就永远无法摆脱丹麦人。

第三部分 9.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9）

梅杰提拔他称之为“讨厌鬼”的对手们，他们的行为更加令人讨厌，他们泄密并密谋反对他。政策上他拒绝让步，直到我们的对欧态度成了对撒切尔主义无效甚至尴尬拙劣的模仿。我们阻止比利时首相让－吕克·德阿纳被提名为欧洲委员会主席，而让一个卢森堡人取而代之，因为他与老谋深算的比利时人相比能力略差，说起来也更拥护联邦制度。我们在投票权和欧盟扩大问题上陷入困境。疯牛病使我们蒙羞，牛肉在咖喱鸡大受欢迎的英国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只要你还没因吃牛肉而死)。我们在欧元问题上做出让步进行全民公决，在阻止选民纷纷放弃投票权上没有取得任何明显成效。我们派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一个聪明伶俐口才又好的苏格兰人）去欧洲各地给我们的同道成员国演讲宣传他们真正想要的那种欧洲。这才是问题要害之所在。保守党内的怀疑论者、反欧洲者和妄想者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来取代让他们牢骚满腹的协定，他们只会说我们确实知道什么才是对欧洲各国最好的，但目前却不能描述得很细。

最坦率的保守党怀疑论者们真的想待在欧盟吗？有些人说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自由贸易区。我们已试过并发现自由贸易区还不够。为什么我们应该协商脱离能满足我们优先考虑事项并且可能轻视别国权利的欧洲？有些人倡议我们应该加入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的行列成为欧洲经济区的一员，或者效仿瑞士，它已和欧盟协商达成了双边贸易协定。我们应选择像瑞士一样的生活（不同的是我们有核武器)，从而保留我们的主权并放弃一切领导欧洲的机会。

在担任欧盟委员一职期间，我负责处理与挪威、瑞士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我的结论很明确。他们在本国享受着更高的主权，而密切影响其经济生活的决策则由其邻居在布鲁塞尔制定。当然我们对此戴上了外交的光环。为了享有我们的市场，他们必须遵循我们的规则，而他们却不制定或者不参与制定这些规则。例如，挪威为了向欧盟出口接受了所有的单一市场规则，并需要向布鲁塞尔缴纳和丹麦一样多的预算摊款，还得不到任何财政援助。我们扩大欧盟时，这些外围国家还要为基金解囊，以此来帮助贫穷的新成员。我记得一个瑞士谈判代表曾打电话给我说，捐献应采取为欧洲贫困地区的发展而自愿捐款的形式，而不是作为进入更大市场的附加费用。我很愿意帮忙，但我们彼此都明白实情是什么。究竟是事实上的主权，还是法律上的主权？

也有一些保守党人希望我们完全脱离欧洲，其立场和英国独立党并无两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吉米·戈德史密斯的民粹主义公投党中进进出出，漂移不定，永远蜷缩在惧外的暮色中，憎恨欧洲，也不喜欢美国。他们还会继续阻碍保守党恢复到更为理智全面的欧洲姿态上。

目前，这些保守党员暂时可以兜售他们对国家主权的忠诚、对千年辉煌独立延续的高声承诺、对噩梦般超国家野心的反对。在他们的计划中，排除肯尼思·克拉克成为保守党领导人的所有希望便是大功告成。肯尼思·克拉克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经济复苏的成功设计师，也是最有能力执掌这个党派并恢复其命运的人。与他持类似观点的人已被驱逐到保守主义的最边缘，沮丧地看着他们所热爱的政党带着毁灭性的幻想继续愚蠢下去。不了解这个新故事情节实在很遗憾。

第四部分 1.追随者还是合作者（1）

美国人迪恩·艾奇逊曾经做过关于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最著名的演讲。迪恩·艾奇逊是美国前国务卿，也是在杜鲁门总统领导下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创立人之一。用那时的英国驻美国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的话说，艾奇逊是“联合王国的一位真诚的朋友”。同时他也是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强烈支持者。和大部分其他的制定华盛顿外交政策的杰出倡导者一样，他相信美国需要和一个复兴的西欧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艾奇逊于 1962 年 12 月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提出了英国国际地位的问题，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没有给出答案。

艾奇逊说：“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帝国的身份，并且尚未找到自己的角色。她企图扮演一种单独的强权角色——也就是说，一种脱离欧洲的角色，一种基于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之上的角色，一种基于对没有政治机构、没有团结、没有力量，依靠在英镑区和英国市场上的优惠而享有脆弱且不稳定的经济关系的’英联邦‘的领导之上的角色。这种角色快要玩儿完了。”在外交中激烈的真理总是很少能被接受，虽然在我看来，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外交”这个词本身通常是诡辩和彬彬有礼而使人困惑的同义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大口吞下心中的不快，民族尊严遭受到了凌辱。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以玛格丽特·撒切尔肯定会赞许的方式给予了回应：“他似乎在诋毁英国和英国人民的决心和意愿，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一个在过去 400 年的进程中很多人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包括西班牙的腓力、路易十四、拿破仑、德国皇帝和希特勒。”之后，麦克米伦继续批判艾奇逊没能理解英联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此后短短几周内所做的两个决定表明了这种特殊关系的限度和潜力，同时也显示了这一特殊关系对其他人所起的效果。英国仍在争取保持某种徒有其名的军事核大国的形象。英国最初选择的下一代军备是“蓝光”导弹，后来被更便宜些的英美合作推出的“天空闪电”导弹所取代。然后美国又决定取消“天空闪电”，而英国则乞求用最低廉的价格购买美国的“北极星”导弹。美国很不情愿地答应了——看起来好像主要是因为肯尼迪总统想要帮助麦克米伦脱离困境。因此，英国得以用这种狐假虎威的核威慑力继续留在核俱乐部，这让戴高乐将军感到震怒，也证实了他本能的怀疑，即英国已成为美国的附庸，并引发了他对英国请求加入共同市场的臭名昭著的拒绝。美国延长了英国的核威慑角色，这是法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同时这也使得美国所希望的英国毫不含糊地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计划流产。这是英美特殊关系影响到美国对自身利益判断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之一。

像英国 20 世纪发生的其他故事一样，特殊关系基本上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创举。当然，他的母亲是美国人。对后来历届英国政府来说，希望能说服美国总统在提到特殊关系时偶尔带有适度的敬意，成了每日的祷词。对于丘吉尔来说，这种特殊关系是将英国和它之前最著名的殖民地团结在一起的感情纽带，同时也是一种老谋深算的地缘战略目标。这一感情纽带是由共享的启蒙运动价值观和“亲戚朋友”的联系锻造出来，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并用共同

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起初，丘吉尔希望与美国的亲密合作关系能够帮助英国紧紧抓住其帝国幻想，或者至少保住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在前一种情况中，他的希望迅速落空；后一种情况中，大部分时间英国都在努力将屁股坐在一个高桌子旁的座位上。

从好的方面来看，英国热衷于与美国的关系反映了它对美国人活力和乐观精神的钦慕。丘吉尔自己也表达了这一想法，在 1941 年的电台演讲中，他引用了亚瑟·休·克拉夫写的名诗：

曾一时疲倦的波浪徒劳地拍击，

似乎再也没有立足之地，

而远处，通过潺潺的小溪和河口，

静静涌来的是滚滚的主流。

当晨光到来，

它不仅仅从东方的窗户照射，

在前方，太阳冉冉爬升，

但向西方遥望，看那片土地光辉明亮！

那片国土或许是“明亮”而“光辉”，但是对于英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并不总是懂得很多。我想起了差不多 20 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国立大学举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这项调查是在演员罗伊·多特里克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个人秀表演之前不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曾经听说过这位伟人。今天这个数字会是多少呢？

而从差的方面来说，英国对美国的痴情包含了相当大的屈尊俯就的成分。1944 年在布雷顿森林谈判期间，当美国态度坚决地把英国安置在新兴的战后经济世界中的位置上时，英国谈判代表用这几句话来安慰自己——“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对着凯恩斯耳语：’他们（美国人）有钱袋子，这是真的，但是我们有的是头脑。‘”

第四部分 2.追随者还是合作者（2）

曾经的强权帝国落入了困境，现在又为其年轻懵懂的继任者充当厌世但明智的良师益友的角色，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这一比喻一直是英国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就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听到它的回音，虽然没有哈罗德·麦克米伦对经典比喻的熟练运用。1944 年，在跟工党政治家理查德·克罗斯曼谈到美国对同盟军的领导问题时，麦克米伦评论道：“亲爱的克罗斯曼，我们是美国这个帝国中的希腊人。你会像希腊人看罗马人一样看待美国人——一个强大、粗俗、忙碌的民族，比我们有活力，也比我们更游手好闲，有许多未被破坏的美德，但是也有更多的腐败。我们必须像希腊奴隶们执行克劳狄皇帝的军事行动那样来运行（盟军总部）。”

这很大程度上说明，英国的美国朋友们已经忍受了这种脆弱的感情和目空一切的胡说八道，因为英国人在这些朋友面前毫无修饰地表现了法国式傲慢，没有像爱德华时代家臣们那样绝望地卑躬屈膝。康纳汀曾在他的《笼罩在丘吉尔的阴影下》一书中指出，伊恩·弗莱明小说中的詹姆斯·邦德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费利克斯·雷特有着类似希腊和罗马之间的关系。名义上邦德屈从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则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敌人造成真正破坏的密探。正如邦德在《霹雳弹》中对雷特解释的一样，在保卫西方的最前线中，最卓著的就是联合王国:“或许只是因为在英国，我们不像你们在美国那样感到安全无忧。对我们来说战争似乎还没有结束。柏林、塞浦路斯、肯尼亚、苏伊士？？似乎总感觉有什么情况正在这些地方发生。”

美国人偶尔自己也会玩玩这些陈词滥调。美国的思想家和前政府官员尤金·罗斯托写道:“特殊关系不是一项政策而是一个事实——这个历史事实不仅反映了对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的共同热爱，也反映了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政治上的一致利益。”这就是普通美国人看事情的方式吗？当然我们很高兴想到美国和英国的公民有同根的文化。这里面电影、流行音乐或时尚比文学更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胶合剂。并且，通常对美国人来说，“国家利益”重于一切。作为美国前驻英大使，雷·塞茨在他的回忆录《在这边》中论述道，国家之间的关系通常不是由情感来促进的，“国家追求他们的利益，而重要的利益倾向于保持稳定，”他写道，“这是国家行为的方式。”

塞茨大使拒绝去打磨英美特殊关系这个铜盘子。在那些年间，美国始终不变地正确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英国却始终如一但不总是正确地认为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应该忠实地追随美国之后。这被称为“作为一个大西洋主义者”和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的“坚信不移者”。偶尔的分歧会使关系更加牢固这一观点似乎不值得去认真考虑。用对美国所说的一切都完全而无限制的支持来定义大西洋主义有时有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但也将特殊关系这个概念扭曲得丝毫不像伙伴关系。好朋友应该能彼此都往好处想对方。他们应该避开敌对状态，但是一方不应该要求或指望另一方服从。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与我们并肩作战，并且每次都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晚到战场，但一到战场就受到热烈欢迎并成为不可或缺的盟国来克服欧洲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最坏影响。日本袭击珍珠港和希特勒对美国宣战才迫使美国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意调查显示，到1941 年 10 月，只有 17%的美国人愿意对德国开战。包括其总统在内的美国人都害怕英国会利用其最强有力的盟国来帮助维护它的帝国。《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在 1942 年 10 月写了一封题为《致英国人民》的公开信，他们在信中写道:“有一件事情我们很确定，我们不是在为维持大英帝国而战。我们不喜欢这样唐突直言，但是我们不希望你们有任何幻想。”甘地在 1942年告诉罗斯福总统说:“如果印度取得自由，那么其他国家会纷纷效仿。”总统对帮助英国和其他殖民地政权来保留“古老的、中世纪的帝国观念”毫无兴趣。罗斯福在斥责丘吉尔对斯大林抱有怀疑态度时说:“你的血液里有着 400 年的贪婪本能，你不会理解一个国家在能够获得土地时却可能选择不要。”罗斯福甚至试着让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以作为战末的一个善意表示。那件事情上美国人没有击中要害，但是在别处，他们在帮助加速殖民地政权从帝国退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结果并不总是让他们喜欢（比如在印度支那地区）。

战争结束前，未来的全球治理机构已经计划好了——在旧金山会议上计划好了联合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计划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任何认为在美国进行货币和贸易谈判时感情有机可乘的人都应该读读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的《凯恩斯

传》。凯恩斯是经济会议上英国代表团的领导人。斯基德尔斯基阐述道："协议不是根据凯恩斯的'一般理论'来拟定的，它反映了美国希望通过最新的金本位来促进贸易自由化。如果协议有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那就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将金融权力集中在华盛顿的决心。"斯基德尔斯基继续引用《商业和金融编年史》里的看法，"代表们没有达成'协议'。他们只是在一张貌似协议的纸上签了字。"一位英格兰银行官员称布雷顿森林会议为"一个骗局"，另一位说它是"仅次于战争的对英国最严重的打击"。它无疑结束了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代。帝国的权威一去不复返，我们作为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复存在了，虽然伦敦现在已经再次建立了自己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的地位。

在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英国和美国联手合作。对于美国来说，新秩序的一部分是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西欧。用美国国务院 1943 年报告中的话来说，当时有一种认识就是"从我们长远的经济利益考虑，一个欧洲联盟就像童谣里的小女孩，不是非常好就是很可怕"。但是到了杜鲁门总统时期，官员们都强烈抨击欧洲一体化不能为美国带来好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都明确呼吁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艾森豪威尔期望能从一个"欧洲第三力量"带来的和平中受益，他希望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相比拟的工业联合体，实际上有比美国更多的技术劳动力"。帕斯卡利娜·维南德在她的研究报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欧洲合众国》中，描述了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美国计划：

第四部分 3.追随者还是合作者（3）

第一，欧洲人应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牢牢植根于经济一体化的欧洲政治共同体。这会让欧洲在全球理事会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并减少民族主义的吸引。西欧也会因此成为与美国平等的政治经济力量。第二，为了两项共同的事业，即世界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欧洲的潜力应该与美国并驾齐驱。

美国人从来都坚定地认为英国应该全心全意地支持这项事业，致力于它的政治目的，不会用条件或理由来隐藏每一点亲欧倾向。比如，当英国拒绝参加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讨论时，美国国会就怨声载道，一些议员提出，如果英国坚持反对加入其中，美国将试图中止对英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

美国积极让英国参与到欧洲的合作中是基于很多考虑的。首先，美国完全不支持英国存留的帝国幻想和在创立英联邦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强权地位。甚至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最具有亲欧倾向的内阁首相也明确地宣布："帝国必须永远处于第一位，欧洲只能排在第二。"这其中涉及的是使命和地位。安东尼·艾登这样解释："帝国是联系我们家族的纽带，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它，我们只不过是居住在欧洲彼岸岛屿上的几百万人，没有人对这些人有任何特殊兴趣。"但是帝国正在融化消逝，家族关系日益薄弱。在 20 世纪 60 年代把呼吁英联邦团结作为抵制欧洲一体化的理由还能引起一些共鸣，但在盖茨克大肆鼓吹的时候，美国人肯定更敏锐地意识到英国的帝国时代已经结束了，而英联邦对于我们政治地位的加强并没有多大帮助。政府从来都没有能够将公众对帝国的热情转移到对联邦上去。英国削减了来自加勒比海和南亚的移民，这使得那些显示英联邦给予所有曾经在英国国旗下居住的人拥有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的努力都成了无稽之谈。甚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很多的保守党党员和英国媒体还坚决反对适当慷慨地赋予以前居住在香港（经常直接为殖民政府工作）的人以公民身份，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允诺他们在 1997 年后可以到英国安家。"我是罗马公民"这句话不能再被转化成一个现代英国的职责。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英联邦

国家在授予香港居民公民身份方面更加慷慨，它们也从被英国拒绝的香港移民中受益匪浅。

第二，毫无疑问美国人感到英国会给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它的经验和正确的判断力。他们相信让英国在前排帮助掌舵比让它在后排只是简单地提供建议和批评要好得多。这种观点很容易渐渐转变成将英国看做是美国在欧洲潜在的特洛伊木马，能够确保西欧主张的政策不与美国的利益相悖。这也是戴高乐所害怕的，即英国会从华盛顿得令并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待每一项欧洲问题。这种对美国意图的评价并不完全公正，但还是有道理的。

第三，美国人相信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净效应会对美国贸易有利。英国的增长率那时已经落后于 6 个共同市场国家，而加入共同市场能够刺激这一增长率，也会增加美国贸易和投资的机会。

美国支持英国的成员地位这一事实也是为什么许多英国政治机构对此不冷不热的原因之一。很显然，能够感觉到美国想看到英国处于第二集团，成为一个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而非一个世界级的玩家。1956 年令人不快的苏伊士远征更加强了这一怀疑；1938 年慕尼黑那次令人感到耻辱的会议所留下的教训常常被用来作为灾难性外交政策的例子之一（伊拉克是最近的事了）。对于那时担任财政大臣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来说，英国和法国不得不在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上校破坏中东稳定之前给他一点教训。伦敦的猜想是美国人不会干预。“我了解艾克，”麦克米伦说，“他会静待时机。”其中暗含的设想是美国人可能会放任英国和法国继续行使帝国强权，华盛顿会对他们偶尔的帝国冒险提供借口。然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误算了。美国人惊慌不安，尤其是侵略对阿拉伯世界的舆论所造成的影响。在联合国，他们要求英国和法国撤军，威胁说除非英国遵从国际舆论，否则他们会踢开所有英镑和英国经济的支柱。英国别无选择：英国的经济太弱不能公然拒绝美国，而英镑区（这个世界大国身份的最后一丝残余）也必须被保住。英国后退了，挫败和伤痕提醒着我们在世界上的真正地位。

虽然英国政府迅速行动试图修复英美特殊关系，然而毫无疑问苏伊士惨败对英国政界的士气是个沉重的打击。诺埃尔·科沃德宣称美国人“行为卑劣”，这可以说代表了很多英国人的心声。当然，在战时及战后的英国总是有反美的回潮，刚开始指向那些美国兵：他们“报酬过高，吃的过多，性欲过剩，并且（感谢上帝）在这里已经结束了”。右翼中存在反美风，比如在伊夫林·沃的小说中就曾提到；左翼中也存在反美风，例如在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中便有体现。美国在苏伊士事件中的“背叛”让这一反美思潮陡然上升。一些店员贴上了“美国人免进”的标语。麦克米伦担心这会在英国增长一种孤立主义情绪，之前这种孤立主义情绪已经指向了欧洲。在 1957 年 12 月，他说：“我们很多支持者的反美思潮，无疑在苏伊士事件上达到了顶峰，但是现在还没有平息。这其中一部分是基于真正的理解，一部分恐怕代表着一种英国式的重病，这种病法国人遭受的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那就是，不是展望未来，而是追忆 19 世纪？？”一些反美思潮是文化上的。我们担心自己正在被美国的价值观所淹没，最明显的例子是好莱坞对电影工业的主宰。我们极力通过津贴、配额和征税来保护自己的电影制作人，但是无论伊琳制片公司怎么努力，充满魅力、性和暴力的加利福尼亚潮流继续向我们涌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引入商业电视开展的辩论中，英国人对日渐美国化的生存方式的担忧占据了核心位置。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反美思潮与政治左翼的联系多于右翼，越南是其起因，尤其是年轻人很认同贫穷的亚洲农民，因为他们抵制了美国 B－52 型轰炸机在他们头顶上投下的成吨炮火。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敌人都会被左翼视为英雄。在越南和柬埔寨开始的一切又在智

利和中美洲得以延续。桑地诺左派成了推动英国市政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这场运动中的勇敢王子是戴维·布朗基特，他后来成了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中的公民自由主义者的重锤。1983 年 7 月 4 日，在就谢菲尔德（他主持成员理事会的地方）的市政厅升美国国旗这一传统接受采访时，他回答说："独立日。如果我们能够独立于美国，这会很好，不是吗？"布朗基特先生应该得到某种认可，因为他完成了从民粹主义左派向独裁主义右派的转变，而在这一历程中他没有受到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的任何影响。

第四部分 4.追随者还是合作者（4）

但是英美特殊关系仍然存在。1967 年英国从苏伊士东部撤军（这是迄今对我们在军事上今不如昔的最有力证明），英美特殊关系得以幸存。在越南战争中哈罗德·威尔逊明智地拒绝让英国军队加入到美国这一边，而美国则斥责其在他们和北越人中间没有尽力调停，特殊关系便被破坏了。特殊关系跳过了希思年代，因为那位在位不长且运气不佳的首相拒绝主动恢复关系，并且表明他首先是一位欧洲的首相，而不是美国的代理人。然而在撒切尔执政那些年，这一关系又喧嚣着复活了。那时虽然就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而争吵不休，虽然美国轰炸利比亚引起了公众的敌意，虽然美国施加压力迫使欧洲减少对苏联能源供应的依赖，虽然伦敦对于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不严肃担心不已，这一关系还是被梦幻点缀并配上音乐。里根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相处得异常融洽；作为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伴侣，他们感觉到正在将自由市场经济的潮流推向顶峰。或许是因为他们联合起来决心要抵制苏联的压力，坚持维护西方事业自身的优势，再加上他们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苏联领导人，这一切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英国设法使其在南大西洋的最后残余免受阿根廷的"掠夺"时，美国人经过最初的疑虑后为英国提供了一些情报和后勤上的支持。除此之外，英美特殊关系在这一时期的"特殊"成果在其他方面很难找到。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普遍的看法是特殊关系已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地缘战略利益的根本转移而基本消失。塞茨大使把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成功的政治联合看做是"古老政权的最后欢呼"。他把随后几年在波斯尼亚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误会看做是时代变化的一个标志。在讨论英国对英美关系的理解以及美国如何看待英国这个小伙伴需要做什么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实际中双方如何看待这一关系。

对美国来说，有一个追随左右并支持华盛顿追求自身战略利益的可靠盟国一直都是很有帮助的。在贸易、环境和经济等相关问题上，英国和其他国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任何涉及安全的问题都带来了紧急命令。总的来说，美国相信英国进入欧洲内部能够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它更关心欧洲一体化而非英国主权。英国在欧盟的成员地位可能会使它与华盛顿的关系以华盛顿难以理解的方式复杂化，因为美国仍然倾向于把更深更全面地分享主权的欧盟和一个同盟国混淆起来。尽管成员地位会使关系变得混乱，但这对于美国却是至关重要的。英国从欧盟退出，甚至半脱离欧盟都会让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忧心忡忡。美国还感到它有权干涉英国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并在不久前这样做了，目的是推动和平进程的发展并确保其成果。我自己想知道美国在对格里·亚当斯和新芬党的投资中得到多少回报。我怀疑亚当斯先生从华盛顿获得的要比伦敦和都柏林从他那里得到的还多。这样想或许是因为我个人对那些蒙混了政治、谋杀和犯罪之间界限的人十分不齿，而我又纵容自己过分地受个人喜恶的影响。

在英国一方的天平上什么比较有分量呢？我们说服自己，我们能够以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方式影响我们最强大的盟国。自从丘吉尔为促成美国和苏联达成协议所进行的努力受到华盛顿的漠视以来，这一影响力被夸大了很多。在对美国具有实质重要性的事情上，英国通常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影响其进程。作为施加这一影响的回报，我们给世界发出一种信号，即美国不是单边主义者。英国实际上是别在美国翻领上的一个多边主义徽章。或许我们作为美国最可靠的朋友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巩固了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地位。我们获得了原本无法获取的情报，尤其是通过全球窃听技术，谁知道作为回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差事？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最重要的情报。前内阁大臣巴特勒勋爵曾经说过，情报是最值得怀疑的。多亏美国的赏赐，我们现在才能是一个核大国。英国官员通常也会发现与美国兄弟们打交道很容易，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任何贸易谈判代表都会证明这一点，或者根据最近几年与华盛顿在交通安全和其他问题上的谈判经历，我自己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一段中表达出来的情绪可大致总结为两个简单的观点。第一，在安全问题上英国通常会与美国保持一致。如果我们和欧洲朋友与美国意见不一致，我们要明智地努力取得共识，这样做符合英国、欧洲和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但是，如果英国一开始就宣布无论美国最终决定做什么，英国作为永远从属的盟国都会坚持自己的传统立场，这么说不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也许从长远看也会对美国不利。第二，外交政策不应该缺少大脑的思考。“感觉”不能代替大脑活动，感情和鲜花不应该凌驾于理智之上。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60 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英国应该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同样，对于英国政策而言，我们的一个永恒主题是我们应该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都发挥影响力。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看法，玩欧洲游戏在国际上束缚了英国并影响它成为美国的一个独立合作伙伴。我们拼命地寻找一个答案来回答迪思·艾奇逊提出的英国扮演的国际角色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明确的选择。理查德·韦特撰写的《爱国者》精彩地呈现了英国战后的历史，也极好地诠释了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况。在借鉴电影史学家尼克·卡尔教授的工作成果的基础上，韦特先生借用流行的英国电影《意大利任务》来比喻英国的问题。在该影片中，一个典型的英国团伙展示了欧洲大陆“该死的外国人”是些什么样的白痴。在由诺埃尔·科沃德①出演的一个爱国罪犯的组织下，这个团伙策划并成功地在都灵抢劫了金条，其意图是用金条来帮助英国应付贸易收支平衡危机。这伙人驾驶一队迷你车②从都灵逃亡，很快就像克里斯先生的鹦鹉一样不能动了。抢劫者将他们的汽车换成了大客车，在飞速穿越阿尔卑斯山时因为拐弯速度太快，装有偷来黄金的后车厢被甩出了公路，挂在了悬崖上。强盗们向黄金挪动的每一步都会破坏大客车的微妙的平衡。在片尾字幕出现时，这个团伙的头目迈克尔·凯恩说：“嗯，伙计们，坚持一下，我有个好主意。”

第四部分 5.追随者还是合作者（5）

对英国来说，这个“好主意”是什么？是独自前行？是在华盛顿的身后口袋中找一个舒适的寓所？还是将命运与我们的欧洲伙伴连在一起？我们能挫败那些像已故的艾奇逊先生那样令人讨厌地坚称我们真的需要选择的人，并向他们展示英国是怎样在大西洋两岸架起一座坚固又可靠的桥梁进行双向交通吗？这就显然把我们带向布莱尔先生、布什总统和伊拉克。关于布莱尔先生和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伊拉克战争已经有了大量充满愤怒的文字，包括一些一流的新闻记载和两份官方报告——前高级法官赫顿勋爵滑稽可笑的贡献，以及前内阁大臣巴特勒勋爵对布莱尔管理政府方式切中要害的批评。我不想再多列举这类东西，更不会像一个乡村老宅谜案的作者那样来确定谁对谁做了什么，尸体被埋在哪里，凶器上是否留有指纹。就伊拉克争论而言，我的起点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结束。

1991 年 2 月份的最后几天，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伊拉克军队正沿着所谓的“死亡高速公路”从科威特城向巴士拉溃退。当时我担任保守党主席，约翰·梅杰邀请我去唐宁街和他共进晚餐，商量接下来几个月的政治策略，尤其是商量一下我们是否应该听取建议，利用他的政治蜜月（他执政仅几个月）和对战争的成功应对来提前举行大选。值得赞扬的是，梅杰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无意利用在主要的反对党支持下取得的军事胜利来玩弄权术。我同意他的观点，那样做会是一件缺乏教养的事情，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也不是一项好的政治策略。晚餐后我们两个单独坐在他的客厅里，周围是打板球获得的纪念品和特罗洛普写的小说。这时电话铃响了，楼下办公室值班的职员对他说老布什总统想和他通话。商谈的要点很清楚。在军事指挥官们的建议下，总统想宣布停战。总统和首相讨论了所有的主要问题，梅杰针对将萨达姆·侯赛因放虎归山的后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他们讨论了联合国发动联军的决议条款、联军破裂的前景以及强行进入巴格达面临的相关问题。我还记得老布什总统的总结性的论述：“如果我们一路追击萨达姆到巴格达，我们就会拥有这个地方。”后来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结果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

1998 年老布什总统在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合写的《重组的世界》一书中曾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努力消灭萨达姆？？将会招致不可估量的人员和政治损失？？我们将不得不占领巴格达，实际上是统治伊拉克？？我们看不到可行的“退出战略”，这违背了我们的另一原则。另外，我们一直在自觉地努力建立一个模式来处理冷战后世界的侵略行为。进入并占领伊拉克意味着单边超越了联合国的授权，这会打破我们希望建立的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做出反应的先例。

老布什总统也看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会与美国产生敌对的危险，以及年轻的美国士兵将不幸陷入“无法取胜的都市游击战”。科林·鲍威尔（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 1992 年的《外交》期刊中写道，占领巴格达会“在财力、生命的损失以及地区关系的破坏方面付出不可饶恕的代价”。或许我缺少想象力，我无法超越这些论述。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一直没有得到教训。整个 2002 年，军事投入保持在最小程度，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不和入侵伊拉克的准备工作产生冲突。欧洲国家发现，躲在美国对安全局势的评估后面，并将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主要是国际维和部队）保持到最小的做法让他们感到很舒服。我们自己开玩笑说已经买到了军阀，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只是租用了他们。在美国和欧洲军队封锁海洛因生产和非法交易的行动受阻后，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迅速增加起来。我们创造了一个有漏洞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需求暴涨，对供应也没有认真严肃的控制。像在哥伦比亚一样，这是一项带来了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并削弱了国家权威的交易，而军阀们却从中牟取暴利。喀布尔沦陷后，在 2003 年举行的东京援助阿富汗会议上，我代表欧盟委员会承诺 5 年之内将至少投入 10 亿欧元用于阿富汗的发展(我们实际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这些——不仅仅是投入财力，并且是在一个危险的环境中签约并支出费用)。从共同体预算中做这样一个规模的承诺，对我来说已经将我的政治权力发挥到了极限，结果是我不得不在会议上承受法国代表团一大堆令人生厌的批评。在 2002？？2004 年间让我们越来越沮丧的是，军阀们贩卖毒品的收入居然超过了筹集来的发展资金，而卡尔扎伊总统领导的政府又由于当时危险的安全境况无法扩展其权力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发展援助。有一段时间，似乎他的政府权力主要局限在千疮百孔的喀布尔内。

英国前保守党国防大臣约翰·斯坦利爵士曾评述说，加入伊拉克战争是英国政府第一次“明确地受情报估计的影响”。2002 年 9 月汇集那些情报评估的档案现在已毫无用处。正如《布莱尔的战争》一书的作者约翰·肯普夫纳所说，那份报告中的九个主要结论没有一个得到证实。不管首相是否暗中默许硬要从情报部门得到他想要的答案，毋庸置疑的是他至少夸大了证据。他自己声称这些证据“全面、详细并具有权威性”，而巴特勒勋爵则更加准确地评价为“很空泛”。2002 年春布莱尔先生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与布什总统会晤，他似乎很清楚地得出了结论，即美国人不会在关于伊拉克的问题上改变方向，英国也不会让他们独自行动。英国参战是因为美国选择了战争。布莱尔先生告诉内阁和议会，或许也说服了自己，他选择参战绝不是因为美国，而是要追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阻止其扩散或使用，通过坚持要求服从安理会决议来加强联合国的威信，废除可恶的、大规模践踏人权的暴君。我怀疑，这个例子可说明某个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观点:“文饰作用或合理化是英国外交政策中一个不受欢迎的特点。”我们现在被引导去相信布莱尔先生一直以来都是专注于萨达姆·侯赛因所代表的危险，尽管他对伊拉克的兴趣（像许多美国官员一样）和以前大不相同。西方国家一度为伊拉克的独裁者提供武器并在他用毒气攻击、谋杀并折磨伊拉克人民时视而不见。在那些日子里，声名狼藉的暴君在“我们”这边：他没能够理解我们使用的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这真的很愚蠢，或者他在大部分政治生涯中对此理解得过于好了。

虽然在 1990 年我参与了英国内阁集体做出的要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加入联军的决定，我自己却从来没有直接做出决定——让年轻人去面对危险或死亡。我记得那时曾对约翰·梅杰说:“做这种决定对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来说尤其困难——我们是英国第一代没有亲历战争的政治家。”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有别于同龄的美国政治家，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现在很热衷于派遣“黑鹰”直升机和“哈姆威”装甲车，虽然用副总统切尼恰到好处的话说，他们在越南战争期间有比在部队服役“更优先考虑的其他选择”。意识到做出的决定会带来死亡、残疾和战争等重大后果，尤其是由那些自己从未经历过战火的人做出这样的决定，让我很不情愿去给那些在参战的必要性上与我的结论不同的人设想卑鄙的动机，或认为他们缺少道德上的忧虑。那么关于布莱尔先生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显然不是一个坏人，但是什么使他说服自己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并且他真正的动机就是他振振有词地所表达的那些呢？

第四部分 6.追随者还是合作者（6）

布莱尔先生的政治天赋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在 2005 年 6 月得以充分展示并让人印象深刻。在那引人注目的一周时间里，他在新加坡进行游说并成功地让伦敦获得了 2012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同时在格伦依格斯主持了八大工业国峰会，并应对了恐怖分子在伦敦制造爆炸的后果。但是关于这位颇有才能的政治家是否有任何信念的问题还是有激烈的争论。詹金斯勋爵指出:“对于我现在或许陈腐的风格来说，他太具有摩尼教的性格，看事情总是很刻板地分为好与坏、白与黑，结果他持有的信念就是如果邪恶被打倒了，那么善良必然会紧随其后。”詹金斯勋爵总结说，灰色这种颜色似乎从他的政治调色板上漏掉了。另一方面，有些人将布莱尔看做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冒险者，极其擅长美国人所谓的“三角政治”（同时触动所有的政治基础——是、不是、或许），化圆为方，找出灰色并用鲜亮的色调描绘。这些批评家可能会将“第三条路”（与布莱尔以及其他中间偏左的成功政治家密切相关的缺乏原则、讨好所有人的政治风格）看做是“看起来通人情的机会主义者”（引用托尼·朱迪特的贴切描述）。布莱尔将他早些年在核裁军运动中反对欧洲看做是成为工党领袖人物的必经之路，而只有成为领袖才能将其政党变为一个更具竞争力且更合理的政治工具。大多数政治老手都承认这一点——一个因为令人满意的结果而接受政治野心的例子。或许我对于政治太过幻想了，我发

现自己对此有点不敢苟同。我更喜欢具有核心原则的政治生涯，虽然我对于夸大这一点犹豫不决，害怕有成为伪君子的嫌疑。

我个人认为布莱尔大抵是个招人喜爱的人，他有自己强烈支持的信念——在他还支持它们的时候。他的信念随着各种不同的问题而完全不同，像打猎、核武器、公民自由权、宪法、欧元和参战的理由，部分是为了反映他认为最具主导地位并且最便利的观点。我一点也不否认布莱尔需要不时地显示相当大的勇气来捍卫他决定奉行的政策。伊拉克正好属于这一范围，虽然首相和他的顾问可能同美国官员都认为过早的胜利会扭转舆论，入侵会被看做是对遭受专制的人民的解放而不是在2003？？2004年间陷入了一个血腥的沼泽。但是，不论他变化无常的立场是什么，布莱尔及其支持者们都坚持认为他的行动应该被看做具有了人们所期望的“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天衣无缝且有原则的连续性。这是他最危险的地方。他的正直不容置疑。他的真实、庄重以及为更崇高的利益而非庸俗的实用主义得到了明确的肯定。他具有不可挑衅的尊严。因此，如果暗示说布莱尔像我们这些从政的大部分人一样也偶尔会吹牛，这真是谣传了。布莱尔的正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捍卫。

布莱尔的行动并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让我们以他想要根除邪恶并代之以善良的格莱斯顿式本能为例。我很赞同外交政策不能不考虑民族因素，也认为权宜之计和道德经常会重叠。但是我不清楚布莱尔具体什么时候正确地拥有这一信念，并且如何清楚地理解其中的一些含义。在1997年，罗宾·库克提出了外交部的使命，他认为要遵循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我不记得唐宁街10号对此做出了什么热情的回应，因为库克先生对武器销售过分的关注和对巴勒斯坦人权问题显示出来的关心举止，无疑被认为是相当令人讨厌的。在外交政策中，你必须谨慎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将所做的事情与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和英国不得不组建一个折中各方利益的合作小组来共同发展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与良治。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数量多得令人有些难堪）都有可疑的人权记录。这些记录虽然不像萨达姆·侯赛因那样差劲，但是显然还达不到让“国际特赦组织”或者“人权观察”满意的最低标准。使命，无论如何圣洁，成就了联合，但联合并不总是圣洁的。我还想知道，在格莱斯顿式的高谈阔论和英国今天实际可以调动的力量之间是否有一种令人尴尬的失衡，这种力量只是我们维多利亚祖先们可以调动的极少的一部分。

布莱尔比大多数领导人更相信个人外交，并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个人魅力来引导其他领导人改变对其国家利益的看法。我很怀疑这一笼统的策略，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会使外交政策的实施缺乏理性和连贯性，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到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作进一步阐述。在希拉克和施罗德与普京交往频繁之前，布莱尔一直在对他献殷勤：普京得到了“最好的朋友”这一称号，并在布莱尔精心编织的、希望能对英国有利的领导人关系网中占中心地位。不管是不是因为格莱斯顿式的自由干涉主义，反正车臣和格罗兹尼的毁灭性战火似乎并没有影响早期布莱尔与普京的会谈。随着普京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在莫斯科公然羞辱布莱尔，并且联合希拉克和施罗德（首相似乎也看错了他们）反对进行伊拉克战争，起初进展顺利的关系变质了。伊拉克战争准备阶段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克里斯托弗·梅耶爵士粉饰了布莱尔的个人外交，他坚持认为首相没有强硬地对布什总统和他的随从说明自己的观点。我自己也怀疑，一旦他在议会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他会将多少坏消息传达给布什总统和美国的政治机构。

在讨论一些后继政策产生的实质性后果以及制定这些政策的动机前，我想更深入地提及一个管理模式的问题。在成为首相之前，布莱尔从来没有在政府任职。这似乎加剧了他对现

行的管理制度、传统的决策方式以及政治家与公务员之间关系的蔑视。权力被集中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及其随从那里，这使得他们在白厅横冲直撞。赫顿报告那令人惊讶的幼稚部分体现在一些假设上，即使呈现在法官面前的证据表明政府仍在正常地运转。对于唐宁街情报部门的首脑来说，直接参与在法庭上说明情报从来都不是“正常”的。唐宁街 10 号的权力集中完全摧毁了内阁办公室执政和监督工作进展的职能，而这一过程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时期就已开始了。这种举措降低了英国政府的能力，并在消除政治家与公务员之间的谨慎和隔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受唐宁街 10 号权力集中影响最大的政府部门之一是外交部。这个部门今天的立场使人回想起当时的常务次官托马斯·桑德森在首相阿瑟·贝尔福暂时主管外交部时写给索尔兹伯里勋爵（那时是外交大臣，但不在办公室）的一封信。桑德森这样写道：“我现在是阿瑟·贝尔福早餐中的一道常备菜，今天早上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注意力在我和新鲜的鲱鱼之间平均分配，一会儿将注意力集中在鲱鱼上，一会儿又很危险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外交事务上。”给首相任命一位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新鲜的是布莱尔拥有太多的得力顾问并由他们直接指导在关键问题上的外交政策。他们不是糟糕的官员，相反他们中大部分都出类拔萃——比如大卫·曼宁爵士，还有斯蒂芬·沃尔爵士，他们都是最出色、最正派的官员。这应归功于布莱尔，因为他选择了他们。但是对于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毫无经验而又过分注重自己对问题的“感觉”的首相而言，主动承担如此多的责任既不明智又很危险。今天的中东政策是在哪里制定的——唐宁街 10 号还是外交部？谁负责处理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最复杂的交往？还有外交大臣的作用问题。在当今重大问题上，外交大臣要把自己当成首相的高级顾问和政策实施者，还是应该专心于那些在首相的雷达防线上微不足道的问题？在讨论可选的政策方案时，外交部往往会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质疑。在伊拉克战争准备阶段及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首相没有听取外交部的意见是一大损失。毫无疑问，越过内阁和外交部来制定外交政策显然不成功。

第四部分 7.追随者还是合作者（7）

布莱尔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主要目标是令人仰慕的。他想与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结成稳固的联盟，并希望英国能够影响其领导全球的方式。他想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联合国为在国际上干预主权国家的事务提供合法基础，以此保护公民的人权并应对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他想让英国在欧盟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使我们在欧盟成员资格问题上不再模棱两可。伊拉克战争是怎样促进这些目标实现的呢？

布莱尔使英国和英国士兵在伊拉克战争中站在美国这边，因为他认为让我们的朋友单独作战对我们以及所有的美国盟国都是很冒险的。他还感到，如果我们愿意同美国并肩作战，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影响美国。有英国作为后盾，美国才能建立一支“自愿联盟”（有人将其幽默地说成“付款联盟”，指的是在这次冒险中许诺给盟军的好处）。如果当时没有英国，美国一定会发动战争吗？答案是它很有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这件事从政治上讲会更加冒险。此外，英国的犹豫不决可能会在美国政治机构引发怀疑。我们来考虑一个荒唐的猜想，如果我们告诫布什政府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重复总统的父亲和他父亲的高级顾问的劝告，这样做会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美国的利益吗？压制我们自己强烈的怀疑，即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在最后时刻开门见山地请布莱尔仔细考虑的怀疑，这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此外，与美国并肩作战使我们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感情依恋是加深了还是减弱了？压抑真实的焦虑而不坦率地表达出来，能真正起到一个好朋友的作用吗？支持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恐怕

是我们给美国提供的最糟糕的服务了。

通过附和这一判断失当的冒险，我们自己得到了什么呢？2002 年春在克劳福德的会晤中，布莱尔让布什和他的高级顾问们相信，无论发生什么，如果有战争，我们都会和他们并肩战斗。根据彼得·里德尔（《紧紧拥抱他们》一书的作者）所说，副总统切尼的幕僚长刘易斯·利比（外号叫“滑板车”）在秋季曾问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既然布莱尔“无论如何都会和我们站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在意联合国？随着使命的完成和伤亡人数的持续攀升，我们对战争的进行、战争正式结束后对伊拉克的管理等实质事情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我在 2003 年 9 月去巴格达讨论关于欧洲提供援助重建伊拉克的问题。经过一段紧张刺激的飞行，我们的皇家空军飞机开始俯冲，迂回进入了降落地带，像一位橄榄球中后卫那样猛冲到了底线，后来又经历了一段同样令人激动的直升机旅程，最后才经过遭到轰炸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部（我的朋友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在此丧生）到达了相对安全的绿区。之后，我们和趾高气扬、精明又自信的美国人保罗·布雷默一起待了 40 分钟。他告诉我们安全状况已经改善了很多，这是一个让人宽心的消息，但却因为一个事实让其可信度大减，他们不让我们在巴格达过夜，其原因并不是宾馆房间紧张或住宿费用短缺。然后我们在以前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个宫殿长廊里走了近 18 米，未见到保罗·布雷默的副手、英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他忠诚地遵守官方路线，在执行时委婉且亲切。但是这位聪明的外交家对于布雷默和他的上司们在五角大楼的决策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对伊拉克的管理参与到什么程度呢？无论占领国犯下怎样的滔天大罪（像清除复兴党党员，采用以色列防卫部队使用的某种过度军事杀伤战术，法鲁加和其他城镇的格罗兹尼化①)，却从来没有人指责英国人，这一点发人深省。没有人让英国承担责任是因为根本没有人想过英国会在决策中发挥作用。英国在那里是封建主的从属物，而不是享有决策权的重要伙伴。

我们曾确信在说服布什及其同僚参与到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方面也曾产生过影响，可以想象有一天这会成为现实。但是在中东和平进程被故意冷落一旁的那些年里，英国的主要作用是为美国的毫无作为寻找借口，而不是寻找理由来促使美国做些什么。2002 年丹麦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欧洲的而非美国的倡议，即所谓的“中东和平路线图”的第一部分（如今欧洲的每个计划都称为路线图)，其目的在于从持续的血腥混乱中拯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对这一计划的优点有些信服。与从前的提议不同的是，该计划赞成双方采取同时行动而不是相继取得进展。以色列过去曾表示（现在仍是如此，无视和平路线图的中心原则)，只有在巴勒斯坦人切实履行了完全安全承诺的情况下，以色列才会在政治问题上向前推进，比如定居问题。在富有想象力的丹麦人起草的计划中，我们敦促双方同时采取措施。在美国、联合国、俄罗斯联邦和欧盟的四方会谈中，我们讨论了这一计划，美方做出了一些完全合理的改变后，美国国务院接受了。布什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支持利库德集团的鹰派成员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作为他在中东的主要顾问，白宫的情况怎样呢？2002 年末，我们去见总统和副总统并商讨该计划。布什总统非常愉快地表示，他将致力于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并实施“一个”路线图，但是他劝阻我们不要早日公布。和平路线图被束之高阁，我们直到 2003 年才最终得到“许可”将其公布。虽然经过无数次的会议和很多的空想，路线图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一些温和的阿拉伯朋友们开始使用“缺少三方的四方会谈”一词，这完全可以理解。此外，坚持双方同时采取行动这一在和平路线图中的核心要素似乎从来没有成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

布莱尔对此必定很失望。在 2002 年的党内会议演讲上，他曾承诺关于中东“最终局势”

的会谈从年底开始。他大概后来一直对华盛顿唠叨着中东问题。2004 年春，他在阿里埃勒•沙龙之后两天访问华盛顿时获得了回报。布什总统接受了以色列总理的计划，其中涉及从加沙撤军、保留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难民无权返回以色列等条件。布莱尔对美国政策的这一急剧变化没有任何反对之词。很显然我们要欢迎这一政策转变，并将其视为沿着与和平路线图完全一致的方向往前跨出的一步。在布什与布莱尔会晤之后不久，我们在一个周末举行了欧洲外长会议。当时是爱尔兰任轮值主席国，他们的外交部长布赖恩·科恩主持了会议。爱尔兰人始终对中东问题很敏感，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在所有制定的计划彻底失败时假装正在取得进展。杰克·斯特劳这个可怜的家伙给我们讲了党内方针，他说华盛顿什么都没有改变，但如果一旦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突破。我们听到这里都有一点吃惊，这就是通过英国非常特殊的关系所实施的影响。无论布莱尔表达得如何有力（他的有力似乎很温顺），他的观点与布什总统的顾问卡尔•罗夫和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的观点相比显然不值一提。我常常会想，我们英国和欧洲在中东及相关问题上表达意见的失败是怎样削弱了科林·鲍威尔和其他华盛顿理智的温和派的立场。

第四部分 8.追随者还是合作者（8）

当然，鲍威尔先生不得不在华盛顿对付那些被詹姆斯•诺蒂描述为“混账的疯子”（在《意外的美国人》一书中）的人，这一描述是用来形容那些新保守主义者和他们坚定的民族主义同盟者，比如副总统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一次与诺蒂先生的会面中，布莱尔让这位作者大吃一惊，因为他宣称：“我从来都搞不清楚人们说的这个新保守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这确实代表了布莱尔对华盛顿这种狂热的政治氛围不知情的话，那么或许他也没有研读过白宫于 2002 年发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用美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话来说，该战略坚称要“把预防战争这一革命性观点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不是先发制人地阻止即将到来的威胁，而是预防了一个猜测中的威胁。如果布莱尔也支持这一世界观，即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发动的预防性战争是可接受的（虽然其他国家还不行），而且美国可以在现实中按照自己的规则为所欲为，那么他就极大地伤害了我们与美国的历史关系，伤害了作为这一关系基础的价值观，也背离了我们之前对国际法治的共同承诺。

在后面的几章里，我还要谈到布莱尔外交政策的其他两个目标，即干涉其他国家的合法化和确保我们作为欧盟领导成员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为了完整起见，我将简述一下实现上述目标的希望是如何落空的。

和其他人一样，布莱尔正确地认为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不足以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该条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开创了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同时也规定：一个国家只有当它本身遭到了别国的攻击时，才应该拿起武器加以反抗并干预那个国家的事务。很显然，这已经不足以成为国际法的中心设想。当一个国家遭受了另一个国家在背后支持的非国家行动者（像一个恐怖分子集团）的威胁或攻击时，该怎样来应对？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瘫痪，由此造成的混乱威胁到了其他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时，其他国家该怎样来应对？（这两种情况都与阿富汗有关。）各国如何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威胁使用和扩散？当一个国家践踏本国公民的人权时，其他国家有无义务去加以干涉？如果无权干涉的话，是否至少有责任（像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雷思·埃文斯以及其他人所认为的）去保护那些国家中人权被践踏的公民？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卢旺达和科索沃问题？是否只是国家有权利，而他们的公民却没有？

布莱尔强烈地感受到，应该有一种植根于《联合国宪章》的实际行动和原则性的国际共识。在我上面提到的种种情况中，如果其他阻止危机的努力失败了，那么这种共识就能使武力干涉合法化。布莱尔于 1999 年在芝加哥做的一次题为《国际社会的信条》的演讲中对这一干涉观点进行了阐述。在演讲中，他列出了五项主要的考虑因素，使我们为阻止“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所进行的干涉合理化。我们对自身的情况很确定吗？我们所有的外交可选方案是否已经竭尽了？有没有可以谨慎采用的军事选择？我们准备这样长期忍受这种做法吗？我们的国家利益牵涉其中吗？布莱尔是不是认为在伊拉克碰到了以上所有挑战？民主国家根据布莱尔教条中所提到的依据来发起战争，试图提前阻止危险（例如，制止由于种族灭绝的企图而带来的令社会动荡不安的难民潮），这一做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特别依赖信任，要求选民们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他们的领导。选民们并没有面临他们必须去抵抗的侵入本国边界的武力干涉，危险没有那样直接！他们必须相信民主领导人的判断力。是不是伊拉克问题或多或少地使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选民在将来可能支持这样的方式——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以先发制人的方式使用武力？选民们是否感到他们被告知了伊拉克的实情——实情是客观地告知选民们的吗？那些为干涉伊拉克问题而提供的理由是否充分？发动战争是结束了恐怖行动还是破坏了和平？布莱尔对伊政策引起的一个主要担心是，它使得将来在国际法和民主社会的公众舆论支持下提出一项先发制人的干涉政策变得困难重重。

很显然，布莱尔一直致力于使英国在欧洲能拥有起到巨大作用的角色。他曾与法国一道，努力发展更加有效的欧洲防御能力（1988 年在圣马洛开始），这让本来安定的华盛顿骚动不安。尽管美国希望欧洲能更好地稳定，但他们很不情愿看到能力发展的欧洲从美国所控制的指挥链条中脱钩。布莱尔担心欧洲目前糟糕透顶的状况是对的：我们的虚荣让美国人担忧，但我们没有更好的能力与他们合作，以便让世界更加安全。

不幸的是，布莱尔的欧洲目标在伊拉克受挫。或许他可以更有成效地架起大西洋两岸的桥梁——面对美国，他代表欧洲；面对欧洲，他代表美国。但是，不时地说出欧洲的怀疑可能需要更加明确且直言不讳的决心。布莱尔是否曾公然反击过美国民粹主义做出的诸如“欧洲吃干酪的投降猴子们”或者他们的“鼬鼠轴心”的攻击？他是否曾努力解释过欧洲公众舆论的力量——在反对伊拉克冒险上比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团结？在和其他支持美国的欧洲政府一道确认拉姆斯菲尔德关于“旧欧洲”和“新欧洲”的观点（该观点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拉姆斯菲尔德是作者之一）之前，他有没有认真思考过？他对马德里爆炸之后的西班牙大选会有面对恐怖分子暴行时胆小懦弱的结果这一暗示有没有抗议过？为在纽约的一个星期没有获得安理会的第二次决议（实际上无论英国怎么努力，这一结果都不可能实现）而指责法国和法国总统，他认为这对英国的对欧政策有什么好处呢？那个星期堪称英国当代外交史上最耻辱的插曲之一。这样单独挑出英国首相来批评是不是不公平呢？这样是不是对人而不对事呢？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和事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即便他自己的政党成员都明确表示怀疑，如果没有他，英国是否也会按照同样的方式去参与伊拉克战争。无论布朗在 2005 年竞选演说台上忠诚地说什么，布朗领导的政府会不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参战呢？现在我们只能希望伊拉克实现和平与民主并为此而努力。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能支持布莱尔，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那段历程。

布莱尔飞到了克劳福德和华盛顿。他告诉布什先生：“你往哪里去，我便往哪里去。”他去了伊拉克。他驱使法国和德国投入了彼此的怀抱（这与英国持久的欧洲战略正相反）。他让英国的国家利益屈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下，在实施英国事实上的主权和法律上的主权方面

引起了严重问题。在因伊拉克问题而导致政治遭到削弱之后，他屈服于民粹主义的媒体压力，就宪法条约举行全民公决。正如 2005 年的大选活动所示，他牺牲了赢得那次全民公决所必需的公众信任。在欧洲，他的地位也被削弱了。因此，当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结果以及施罗德和贝卢斯科尼的政治问题给他带来一个抓住并制定欧洲议程的机会时，他缺少足够的政治权威来做这些事情。布莱尔对特殊关系的诠释使他自己成为受害者，他实在是太有可能被历史评价为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在维护布什在伊拉克的议程上比支持他自己和英国在欧洲的战略目标上更勇猛。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购买正版。